

## 102. 02. 03 菁英專案參訪活動





102. 02. 07 重要幹部屆退表揚暨歡送會 (刁文川中校)



102. 02. 18 新春團拜活動



102. 02. 25 正期102年班敦陸遠航啟航





**102. 03. 01 司令董上將蒞校視導**



**102. 03. 06 陳曉明校友蒞校捐贈文物**



102. 03. 12 日本厚木基地海自隊友會蒞校參訪



102. 03. 18 中視侯乃榕主播蒞校專題講演







No. **2**  
Vol. **32**

Quarterly 2013.05

發行人／陳新發  
總編輯／殷洪元  
主編／劉廣隆  
執行編輯／何愛珠  
攝影／劉廣隆 林文炫 趙尉翔  
發行單位／海軍軍官學校 [www.cna.edu.tw](http://www.cna.edu.tw)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102年05月發行第32卷第2期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36年6月  
定價／新台幣230元  
電話／(07) 5813141#781806 (07) 5855493  
社址／813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669號  
電郵／[navalofficer@mail.cna.edu.tw](mailto:navalofficer@mail.cna.edu.tw)  
印刷／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401廠南部印製所  
本校保有所有權利，刊物內容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刊同時刊載於 <http://www.mnd.gov.tw/>  
GPN/2003600006  
ISSN/1997-6879  
展售處／五南文化廣場及網路書店 04-22260330  
臺中市中山路6號 <http://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店及網路書店 02-25180207  
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http://www.govbooks.com.tw/>



版權所有，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欲利用本刊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及書面授權。

- 36 全民國防之構思與落實 蔡金倉
- 46 Re-examining the U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張競
- 66 軍校國際化之希望工程  
——談第二外語法語的推行 孫毓德



# 海軍軍官

08 陳策與徐亨師徒情深義重 陳降任

16 海事博物館介紹 鄧元黎

24 前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 陳立中

Contents

# 陳策與徐亨師徒情深義重

著者／陳降任

海軍官校39年班航海科  
歷任海軍淡水巡防處長、漢陽號驅逐艦長、驅逐艦戰隊長、攻擊支隊長  
曾兩度出任中美海軍聯合艦隊演習指揮官

## 中國海軍派別林立

談起抗戰以前中國海軍派系林立，有福建的陳紹寬、廣東的陳策、東北有沈鴻烈與後來崛起的電雷歐陽格，他們彼此各自為政，派別分明，關係並不融洽。

## 國父暱稱陳為策叔

廣東的陳策，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屢建奇勛，贏得同志對他一致尊敬。凡與他親近者，覺得陳策這個單名不便稱呼，於是國父便順口暱稱他為「策叔」，從此大家對他便以「策叔」尊稱之，其「策叔」的大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後來，前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別具匠心，以「策叔」諧音為他取號「籌碩」，其涵義有蓋籌碩畫之意。

陳策學生時代嚮往革命，是國父的忠實信徒。因此，他對黨國甚為忠貞，是國民政府頗為信任的一位海軍將帥。

## 進入黃埔海軍學校

陳策廣東瓊山人，生於遜清光緒20（1894）

年，譜名明堂，幼時隨父僑居星洲，一到啟蒙之年就被送回瓊山故鄉入學就讀。畢業於肇新小學，旋即考取廣州工藝學堂。這是一所由廣東勸業道，陳望曾所辦的學堂，陳望曾是台南市人，字省三，同治13（1874）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士途騰達，先後出任廣東雷州、韶州知府與三任廣州知府，又任廣東勸業道。其人思慮周密，治事有方，深受百姓愛戴。他提供工藝教育，在廣州設立工藝學堂，為少年學子所嚮往。陳策入該校學習織染、製紙等科，與後來廣東名將以鐵軍聞名於世的張發奎將軍（向華）為同學。後來年稍長，因思想澎湃，不滿清廷政治日腐，遂轉入廣東水師學堂就讀，使其有乘風破浪，擊楫中流之志。

民國元（1912）年水師學堂易名為黃埔海軍學校。在學期間，已是滿清末期，人心思漢，革命怒潮風起雲湧，陳策胸懷大志，於民前1（1911）年，毅然加入同盟會，獻身革命行列，當時監誓者為先烈朱執信。

未幾，辛亥武昌起義，全國各省紛紛響應，陳策加盟不久，便展開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



他潛回瓊州（海南）策動義舉與同志秘密組織革命敢死隊，自任炸彈隊長，從回鄉進攻海口入府城與負隅頑抗的雷瓊兵備范雲梯浴血激戰，陳策率隊衝鋒陷陣，作戰英勇奮不顧身，不幸被槍彈掠傷胸部幾瀕於危。民國肇始，陳策再進改組後的黃埔海軍學校繼續學習。

## 響應討袁護國號召

民國4（1915）年，袁世凱洪憲稱帝，他的爪牙，廣東督軍龍濟光，廣惠鎮守使龍覲光弟兄二人為虎作倀，狼狽為奸，陳策立即響應國父討袁護國的號召，與同學密謀炸斃龍濟光事洩未果。後又得悉龍覲光要來校檢閱，又因事洩不果。嗣後，陳策並未氣餒，他又策同同學，在珠江省河奪取龍濟光的座艦寶壁號，原先約定與陸軍方面的志士響應一致行動，但因失約功敗垂成，迫使陳策逃亡香港。在港復為瓊崖中華革命軍餉購械功績卓著。翌（1916）年5月，袁世凱被迫撤銷帝制。四月廣東獨立，龍軍瓦解，陳策也於是年從黃埔海校第十五屆駕駛科畢業，奉派肇和艦見習。



1. 徐亨將軍（後立著海軍制服）以海軍游泳代表隊兼副總領隊身分參加上海全國運動會，二排右二為海軍中將陳策將軍。
2. 作者陳降任（左）訪問徐亨將軍時留影。
3. 徐亨將軍（前右）與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成聖教授（前左）、奧委會吳興強顧問（後右）、汪清澄教授（後左）合影。



1. 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時，徐亨將軍（前排右4）協助陳策將軍（2排中座，左手裹白色繃帶者）帶領英軍官兵突圍，安全抵達我軍防地惠州。
2. 由名書畫家葉公超、高逸鴻、歐豪年、朱慕蘭、鍾壽仁合作，陳子和寫松並書贈給徐亨畫作「春滿華堂」。
3. 抗戰勝利，徐亨自美接收永寧軍艦（左）回國，右為航跡圖。

## 砲擊督軍莫榮新署

民國6（1917）年，國父南下護法，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宣言在廣州成立軍政府，推舉國父為海陸軍大元帥，聲討北洋軍閥。次年，廣東督軍莫榮新，驕橫跋扈，對國父之令陽奉陰違，甚至擅行捕殺大元帥府的衛隊官兵，國父大怒決予懲處。莫榮新悍然不應，竟以厚利誘脅海軍，由他負責發放海軍薪餉，離間海軍官兵疏遠國父，逼得國父下令海軍砲擊觀音山督軍署。不料海軍竟將艦隻駛離廣州開往黃埔宣告戒嚴。國父忿不能忍，便在1月3日晚由陳策與夏重民等親信率同衛隊拱衛下登上同安、豫章兩艦，命令立即敲碇開往中流砥柱附近，發砲轟擊觀音山督軍署，兩艦艦長懼怕不敢應命，國父便與海軍出身的陳策親自開砲，轟得莫榮新懾服聽命。這便是當年轟動一時的所謂



「砲教事件」，而陳策與夏重民等親信厥功至偉。

## 陳策澳門牢獄之災

南北和議進行到民國8年，莫榮新故態復萌，陰謀破壞護法，陳策痛恨至極，又率同志同學多人，奪取江大、江固兩艦，並連絡陸軍以水陸兩部義師合力突擊，聲討莫榮新，攻佔江門關，當時水路雖然得手，不料陸軍第三師魏邦平爽約遲遲不發，以致功敗垂成。而號稱南下護法的北洋艦隊竟然違背初衷，同時豫章等艦向起義的江大、江固兩艦追擊，逼迫陳策因眾寡懸殊，只好帶領兩艦駛赴澳門，卻被葡萄牙人囚禁，使陳策惹上牢獄之災身被毆打。莫榮新又向澳門政府要求引渡回穗，國父獲悉後，立即致電澳門當局，並派哲嗣孫科親往交涉，才將陳策釋放歸來，陳策羈留期間，盧太夫人時往探視，建有母子之情。

## 攻克在粵北洋艦隊

民國9年驅逐莫榮新一役，陳策冒險犯難，響應粵軍自福建回師攻克廣州，擊敗莫部，迫使莫榮新率其殘部逃離廣州返桂而去，並通電取

消自主。11月29日國父自滬返穗，迄至民國10年5月5日，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陳策出任廣東航政局。11月18日，國父在廣州東較場舉行北伐誓師典禮。旋即偕同胡漢民、許崇智等沿西江去桂巡視廣西各地。12月4日駐節桂林，並在此設立大本營。陳策始終隨往，並改任廣西撫河船舶管理局局長，負責軍需輜重，由西江水運輸往。

民國11年3月，陳炯明勾結軍閥，阻撓北伐大業，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仲元）在廣州被刺。北洋艦隊有叛離北返企圖。國父返回廣州加以鎮撫，時在粵的北洋艦隊軍艦泊碇在長洲砲台水域，陳策先接任長洲要塞司令以便控制，國父並密派陳策與溫樹德於4月底召集同志，對在粵的北洋艦隊予以全部攻克。陳策奉令後即以機敏勇敢的行動，率屬將海圻、海珠、肇和、永豐等十餘艘軍艦全部收回重新改組，使海軍艦隻悉數落在陳策之手，致廣州城內陳炯明不得不有所顧忌，不敢公然稱叛。而陳策的冒險犯難之大無畏精神深為國父器重，旋調任為廣東海防司令。

## 馳援國父廣州蒙難

6月16日陳炯明叛變，圍攻觀音山總統府。陳策是夜適在東堤一家酒店「襟江樓」敘宴，聞變急從二樓躍下趕去。適國父隻身化裝脫險，未帶衛隊，匆匆走到海珠海軍司令部，情況危急間不容髮，所幸為陳策迎往楚豫艦，後轉登永豐艦，並由陳策指揮永豐艦長馮肇憲、楚豫艦長招桂章（有說是歐陽格），舞鳳艦長袁良驊、永翔艦長丁培龍、寶璧艦長李芳、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總台長陳鐵菴，在判軍團團圍困之中苦撐力戰五十五天之久。當時南方軍政府內政部長蔣介石也從上海星夜奔來廣州，登艦襄贊國父力拒叛軍。終於8月9日脫險，國父安全離艦。此一重大史實為我國民革命史上留下永不磨滅的一頁。而陳策的大名因此而為天下所知，名留青史。

## 北洋艦隊司令變節

不料，未幾，北洋艦隊司令溫樹德等變節改採中立。幸永豐艦長馮肇憲、楚豫艦長招桂章、同安艦長歐陽格、舞鳳艦長袁良驊等均與陳策深交，志趣相同，效力革命，共濟艱危。國父遂命將各艦統歸陳策指揮，而與叛軍對抗，終以北伐軍許崇智部回師失敗，南雄為叛軍佔領，致前方陸軍戰機已失，而海軍難以獨力應戰，固守省河，有損無益，國父乃於8月9日乘英國摩漢號砲艦駛往香港，再換乘俄國皇

后號郵輪赴滬，陳策與黃惠龍等隨侍同行。艦隊委由秘書林直勉處理善後。參軍李章達代為委辦，並發放一個月薪餉作為艦隊官兵忠勇慰勞。

## 出任第四艦隊司令

民國12（1923）年1月，陳策再度奉令回穗，說服海軍廣東江海防艦隊司令響應討逆。十四年國父不幸逝世，陳策致力清黨之役，任海軍第四艦隊司令。18年以後，迭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21年秋赴歐美考察軍事，翌年回國任海軍部軍令處處長，25年乃將全部留粵艦隊歸屬中央統轄，促成全國統一大業貢獻卓著。

民國26年抗戰軍興，陳策受命出任虎門要塞司令，力阻日本海軍由珠江進攻廣州，次年春，陳策因左腳患有血管硬化症，請辭後赴港就醫，並將左腳鋸掉。出院後他以不屈不撓的意志與大無畏的精神，在日軍進攻香港一役中成為香港戰亂的治安維護者，任抗日義軍總指揮，力阻日軍進犯，也是太平洋戰役中首位聯軍總司令，名揚天下的大英雄。

## 徐亨任陳策隨從參謀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陳策奉派駐港軍事代表，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負責國民黨總支部、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專員辦事處、



賑濟委員會等各機關，全盤業務工作十分繁重。其時徐亨海軍中校，擔任他的隨從參謀，為他最親密的得力助手，也是陳策患難與共的忠實愛將，尤其在後來參加香港突圍事伯中貢獻卓著。

## 太平洋戰爭突爆發

民國30（1941）年12月8日，清晨7點多鐘，原先住在九龍太子道寓所的策叔全家，突然渡海來港，搬到徐亨家去暫住，並告知「今晨4點半，日軍已在馬來亞之北暹羅灣以南地區登陸，檀香山珍珠港和馬尼拉等地也都遭到日機轟炸，這正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此時，港九上空已響起轟炸機的隆隆聲音，只見20多架日機臨空，分批輪番轟炸九龍散德機場和深水涉兵營。香港頓時陷於一片驚慌駭亂之中。策叔立即電話通知中央留港的各重要同志，請大家提高警覺。當時策叔立即電邀我軍令部在港的副廳長鄭介民，一起往訪香港英軍司令，舉行緊急會商。接著回到總支部召開中央駐港各機關的代表大會，應付變局。當天午後，日軍主力即向九龍新界英軍防線大舉進犯。入夜，日軍增援猛攻，戰況十分激烈。於是在策叔的號召之下，網羅我方駐港精英成立「中國各機關駐港臨時聯合辦事處」，下設秘書、軍警、外交、情報、宣傳、財務、交通、糧倉、總務等九組，由陳策親任主任委員，徐亨負責交

通，辦公處設在總支部，每天上午9點舉行會報，英方立即指定了五位代表參與會議交換情報。卻因少數單位出於自私心理與本位主義，重要時刻未予配合，首先是中央銀行鍾姓經理，托詞推諉無暇與會，以致影響我方在港的其他銀行，使財務組形同虛設，當工作推展需款孔急時，只好由策叔與徐亨利用私人義向友好舉貸鉅款濟急，並向英商匯豐銀行逐日告貸，苦不堪言。再是炮火連天，戰況緊急，致許多中央大員與重要幹部亟待撤離香港，經向中國航空公司派機疏運「遭該公司黃姓總經理推說無機可派，事後方悉中航的職員與眷屬已經搭機離去，此一事件曾引起大後方輿論指責口誅筆伐，掀起軒然大波。幸而所有中央在港各單位均能群策群力，衷誠合作渡過一個天大難關。

## 日軍迅速侵犯港九

12月10日起英軍節節失利，港九交通斷絕，糧食匱乏，物價暴漲，日機不斷分批空襲轟炸，日軍在九龍市區潛伏有第五縱隊，糾合漢奸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四出劫掠，策叔首先派出同志保護九龍方面的中樞要員渡海來港，當晚他去香港電台廣播勉勵僑胞鎮靜，遵守秩序，並盡量協助英軍抵抗日軍。

11日下午情況益趨紊亂，港督代表與香港警司相偕往訪策叔，告知香港方面潛伏的日軍第

五縱隊將在當夜三點掀起暴動，港督正式向陳策助，希望港民合力肅清暴徒，陳策當機立斷決定運用香港的幫會力量，召來香港青洪幫領袖張子廉、劉伯琴、馬華逸等，組成「香港中國抗戰協助團」隸屬於聯合辦事處之下，公推陳策為團長，以各幫會領袖為基幹。在跑馬地設立指揮部，對外用「忠義慈善會」的名義，自動參加的忠貞僑胞血性男兒為數竟達一萬餘人。

## 九龍失陷危及香港

香港保衛戰從12月8日揭開序幕，12日九龍失陷，香港淪為暴露於日本海空軍凌厲攻擊下的一座孤島危城。惟一希望是廣東省境內的大批國軍來援，13日收到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與廣東省主席李漢魂來電告知，援港大軍的先頭部隊已於12日進抵樟木頭，使抗日團大為振奮，據悉在香港危殆時刻，英首相邱吉爾曾密令港督，寧向日本投降不可使香港落入中國人之手，理由是降於日人，將來尚可收回，否則就等於把香港交還給中國了。此一極機密消息是後來跟隨陳策突圍逃出香港的英國軍官透露，相當具有可靠性。

其間日、英經過兩度談判破裂，戰火迅速蔓延，香港烽火四起，濃煙蔽天，死傷枕藉，電廠中彈起火，頓成黑暗世界，繼又水管被毀全港無水供應，英軍逐步後撤，日軍所到之處姦

淫擄掠，大肆屠殺令人髮指。戰事愈演愈烈，英軍山區前線指揮部失守，加拿大司令蘇森少將與其參謀部屬20餘人皆力戰陣亡。

## 決計突圍英軍響應

那年耶誕夜，徐亨與陳策隨侍余兆騏、梁寒操夫人等人在告羅士打飯店，耳聽排山倒海的槍砲聲，房內鴉雀無聲，陳策打破沉寂從容告知大家：「如果我們援軍不克趕到，香港一旦陷落，我寧死不做日本人俘虜，決定冒險突圍。」接著他拿出護照，在上面振筆急書「不成功則成仁」六個大字。又寫了兩封信給他堂上雙親，另一留交夫人，信交其弟陳籍，囑其立即離開，室內氣氛，肅穆凝重，具有訣別意味。

香港保衛戰持續到17天，就在12月25日耶誕節，陳策接到英軍電話，說英軍已無法抵抗，只有下令停戰。陳策以堅決的口吻告訴英方：「本人決計突圍，英軍如果有人願意相從，請立即到亞細亞行來。」結果幾乎所有的英軍高級將領都願意跟隨陳策一起突圍，並允予魚雷快艇五艘全部撥交陳策使用。

午後三時計有英軍官兵數10人，與陳策會合，他們先從香港仔灣衝過敵軍火網，直駛鴨脷洲盟山背停泊，等候陳策的電艇會齊後繼續突圍。當時只有徐亨與余兆騏及副官楊全三人同陳策同行。與英軍將領相繼登上一艘電艇後



立即疾駛鴨脷洲，不幸未過半里便被淺水灣西角（今日之海洋公園）上的日軍發現，以機槍密集掃射，後又加小鋼砲轟擊，電艇暴露於日軍槍林彈雨中，眼見艇上十多人已無生還可能，幸賴駕駛從容鎮定機智靈敏，使電艇得以衝過彈雨繼續往前駛過一程，不幸就在此時舵手中彈身亡，艇長與兩名士兵也受傷栽倒艙面。

## 英將傷臂陳策破腕

不久，英遠東情報局長麥都高中彈傷及左臂。策叔頭部中彈，幸戴鋼盔無礙，但左腕中彈血流如注，徐亨即用手巾為策叔裹紮。其時主機被敵擊毀洞穿入水，即將沉沒，策叔當機立斷下令棄船，徐亨一面幫策叔脫去鞋襪，解下左足義肢。徐亨是虔誠基督徒，他即建議策叔向上帝祈禱，求神庇護，策叔以一種奇異眼神看著徐亨說：這次如能平安脫險，我一定受洗。接著徐亨扶著策叔，英國軍官羅斯保護麥都高局長以及楊全殿後，五人相繼躍入海中，往海口小島游泳前進，敵軍機槍繼續向海中逃生者密集射擊，策叔既失一足，又傷一手，雖諳水性，然天寒水冷，以一手一足於彈雨咻咻中衝波逐浪，自料難於倖免，當此九死一生之時，載沉載浮歷二小時半，黃昏始達鴨脷洲旁一小島，策叔經徐亨之助攀登礁石上岸，因他傷口還在流血，加以飢寒交迫身體更加孱弱，

疲憊不堪，他便猝然倒向地面，徐亨趕緊撕破自身的內衣，做成幾條繃帶，在敵軍砲火下替策叔裹紮傷口，遂即將其躺在一岩石背後，躲避敵軍砲彈，豈料對岸敵軍以機槍往此小島猛射，並用燃燒彈焚燒島上草木，火光遠照，在此萬分危急中，策叔命眾人先行入海掠波而前，再派快艇接他。幸遇先前開出之五艘魚雷快艇，即派小舟來救，計在冷水寒風中已歷3小時有餘，檢點人數，艇長與英兵三人殉難，隨侍余兆騏失蹤，抵達南澳已是午夜一時許，當地游擊隊總隊長梁永元率部來迎接，遂將各快艇上軍用無線電機搬出後，即將各艇鑿沉以免資敵，並由梁部護送夜行晝伏，衝過敵軍防線，終於抵達惠州城。

## 突圍成功信奉基督

徐亨陪同策叔輾轉赴渝，受到各界熱烈歡迎，蔚為抗戰期間一大奇事。中央頒發陳策將軍一等干城獎章，英國大使館代表英皇喬治六世頒贈陳策將軍K. B. E. 爵士勳位，頒贈徐亨O. B. E. 勳銜，盟國報紙競相刊載陳策將軍領導大家突圍脫險的詳情，並尊稱陳策將軍為「世界英雄」。而令徐亨最感欣慰的，就在次（1942）年12月25日——香港突圍周年紀念當天，陳策將軍竟在重慶基督教會受洗，以「安德烈」為教名，從此信奉基督。👁️

# 海事博物館介紹

著者／鄧元黎

海軍官校69年班  
南非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996年班  
歷任海軍大岡艦艦長、海軍速陽艦艦長

## 壹、前言

南強北強、共驟一堂、夜以繼日、窮究曲章……海軍是國際軍種，也更是知識性極高的軍種，官校畢業所代表的是「通識性」教育的基礎科目已完成，但是呢！年青的海家班軍官們，你/妳們的專業能力、國際知識、對近代海權的興起與海洋歷史常識的瞭解還差的遠呢！為了讓官校學生更瞭解海洋且更具有「國際化」的視野與高度，所以從民國56年起官校的應屆畢業生有了「敦睦」遠航的訓練，這是中華民國海軍重要的一步與進展！

然而由於以往許多年國內並未重視「海洋教育」與「海洋文化」的宣導，因此國內一直沒有設立「海洋//海事」博物館，直到近年才有較具規模的「海洋//海事」博物館出現！筆者近年雖已非現役現職，但有感於對海官校的熱愛，因此撰寫此文，希官校應屆畢業生能在「敦睦」遠航訓練前，以校外教學方式讓每一位在校生能參觀二所非常棒的「海洋//海事」博物館，如此必可倍增「敦睦」遠航訓練的成效，亦可讓官校學生快速的瞭解到海洋歷史的全程概念，亦必對其日後的海軍生涯必定有所助益。

## 貳、高雄『陽明海運海洋探索館』

### 一、探索館位址與特色

筆者首先要介紹的是位於高雄市「旗津」區紅燈碼頭的「陽明海運高雄海洋探索館」，因其位於高雄市，與官校距離頗近，是十分容易前往的一處「海洋//海事」博物館，此放在首位予以介紹。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一本館位於旗津的紅燈碼頭暨風車公園附近。「陽明

海運公司」為了推廣海洋文化，成立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進行推廣海洋文化，因此在2007年向高雄市海洋局承租海洋探索館，經過整修過後開館使用，命名為「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場館最大特色是館體建築搭建在突堤碼頭上，整個館區以一艘二層樓的船舶為造型，由外觀看來彷彿就像是一艘郵輪停泊於岸邊！由於場館兩舷側都位於航道，整體感覺像極了一艘航行於海上的白色大船，是一座「遊輪船造型」的博物館。而甲板上有駕駛台、煙囪



以及桅杆，並掛滿信號旗與串燈，增添了真實感，無論白天或晚上都是高雄港區內最引人注目的耀眼地標。建築外觀的船型意象，象徵自由與開放，它特殊的船體造型，彷彿一艘停泊於高雄港內的大船，與航道上往來的貨櫃輪、漁船和偶爾來回穿梭的軍艦交織成一幅美麗的港灣風情。

## 二、展覽館介紹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內有許多設施與介紹，有遠古到現代的各種船隻介紹，也有許多種海生動物的圖片和簡介，館內還有露天咖啡區和表演區以及許多有趣的設施，讓民眾可以用有趣又貼近生活的方式認識海洋、親近海洋，陽明海運有時候也會在館內的3D立體放映館放映有關海洋的有趣動畫，如果有團體事先預約的話，館方還會安排「專人導覽解說」。

當進入場館入口處時，立刻吸引人們目光的



是一座美麗巨大充滿「力與美」巨大的金黃色「驅逐艦車葉」、大門

前美麗的燈塔及一旁的海軍Mk 38雙聯裝127mm(5吋)艦砲與艦上的「鯨型小艇」！這些珍貴的艦上標準裝備，皆來自於本軍資陽號驅逐艦(DD-930)上的美軍標準作戰配備(資陽艦主甲板以上的前半段現永久展示於海軍軍官學校的校區內)。

海洋探索館一樓規劃了二個展區(第1展覽室暨第二展覽室)、3D立體動畫電影院和多功能會議室，展示多件具歷史性的船模、通識性及趣味性的展板與互動遊戲，介紹海洋文化知識，其以海洋歷史發展船舶模型、近代貨櫃船運發展現況及航海文化三大主軸演繹；3D立體電影院有40個座位，從一開始就設計成HD高畫質格式，假日經常吸引滿座的遊客觀賞。一樓的展覽館會隨著各個不同的時期而有不同的展覽供民眾參觀欣賞。

海洋探索館二樓則有兩個露天區塊，分別規劃為臨海眺望的露天咖啡座及表演舞台，該兩區是坐擁探索館最佳的觀景平台，向外看去整個高雄港便能盡收眼底，因此能愜意的欣賞美麗的高雄港和旗津漁港，更可以遠眺高雄市區的天際線，靜靜的享受悠閒寧靜的時光，在這

裡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觀賞來往的船隻，體驗遊輪在海上航行的感覺，使您不用真正搭上郵輪出航，便能享受到在郵輪上度假的感受。館內設施提供民眾來到探索館一遊的同時，也能隨時兜滿一心的喜悅，體會恬靜自適的氛圍，一覽高雄港全貌，是民眾親近海洋、認識海洋與體驗海洋的最佳場域；夕陽西下時在頂層的露天咖啡館點杯咖啡，和三、五好友聊聊天，等到黃昏的時候欣賞美麗的夕陽與旗津的美景，也是個很棒的選擇！

### 三、展覽內容介紹

#### （一）【第一展覽館//跨世紀經典船舶特展】

跨世紀經典船舶特展(Cross-century Classic Ships Exhibition)；本特展為常設展，介紹由古迄今，東西方人民應用於航海上的智慧結晶，融合了天文地理的海洋知識、船舶演進設計、航行輔助設備等，透過船舶模型展示，引領你來全面體驗海洋廣袤迷人的魅力！世界船舶的發展儼然是人類海上冒險的拓展史－離開腳下的土地，利用水運工具克服生存環境，前往未知領域。當航海技術逐漸進步，海洋的角色，也逐漸由被視為人類征途的盡頭，轉為帶領我們探索未知世界的管道，在跨世紀經典船舶特展中可以觀察與聯想的特點有：

1. 船舶模型的觀察應注意船的「推動裝置」，試比較「明朝時代的運輸船」與同樣使用風帆作為動力的西班牙商船「聖瑪利亞」號

與美國的「五月花號」，到底哪一種風帆的構造較有效率？再觀察英國大東方號的風帆、明輪與螺旋槳等「推動裝置」，哪一種裝置最有效率？

2. 聞名古今中外的歷史名艦如1765年英國造的「勝利號/H.M.S. Victory」，為英國皇家海軍的一級風帆戰艦，費時6年完成，曾在1797年的法國大革命中大勝西班牙海軍；並在1805年



10月21日的「特拉法加」海戰中為英國海軍艦隊司令納爾遜將軍的旗艦，此役納

爾遜領導的英國皇家海軍，在西班牙南部海域擊敗拿破崙領導的法西聯合艦隊，這場海戰奠定了英國在此之後近150年的海上霸權地位，這場戰役對於當時歐洲的戰略天平與此後歐洲霸權之間結盟的態勢，有如滑鐵盧戰役般的影響鉅大且深遠。勝利號戰艦是現存的最古老戰艦，目前仍未宣布退役，現停泊於英國的樸次茅斯港內，作為海洋歷史博物館之用。

#### （二）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2012年「詩情畫意訪古船」特展年度大展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2012年度特展為：「詩情畫意訪古船」特展。本展於2011年12月27日起-2012年12月9日止為期一年，在探索館第二展覽室展出。本次展覽以古船、古詩、油畫欣賞為主題，融合了中國文學、繪畫、古船舶等





三大展示項目，並以訪詩、賞畫、論船為闡述主軸。本次展覽中可欣賞到「楓

橋夜泊」裡的夜半鐘聲到「客船」；「下江陵」的「輕舟」已過萬重山；「楚江懷古」的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等精緻古船。

### (三)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2013年「鯨豚狂想曲」特展年度大展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今(2013)年度特展為：「鯨豚狂想曲」特展。本展於2012年12月25日起-2013年12月8日止為期一年，在探索館第二展覽室展出。本次展覽以認識「鯨豚」生態與



「海洋保育」及「海洋人文」為主軸，並從「寓教於樂」中認識鯨豚，且藉此特展提醒國人保

護我們的海洋，進而保護我們未來的「生存環境」！地球只有一個，畢竟這顆充滿海水美麗的藍色星球是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唯一「若亞方舟」，若不好好保護這顆藍色星球，人類的下一步又能如何呢？

### 四、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各項相關資訊

1. 海洋探索館(MUSEUM OF MARINE

EXPLORATION)；簡稱MOME

2. 位置：高雄市旗津區南汕里北汕巷50-61號（旗津漁港內）

3.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09：00至下午17：00；休館：每週一、除夕、春節初一

4. 票價資訊：內含3D立體動畫電影院費用 /門票最後販售時間下午16時30分

5. 票價說明：

全票：50元

優待票(1)：40元(20人)以上之團體

優待票(2)：30元『國中(含)以上學生，

不分個人或團體(憑學生證購票)；高雄市旗津地區居民(憑身份證明文件購票)』

免費：國小(含)以下、65歲以上長者、身心障礙者及其陪同人員一位、教師、旅行業導遊或領隊(憑相關證件)

6. 導覽服務：預約導覽：請於一週前預約時段及參觀人數。

7. 定時導覽：請洽本館一樓服務台。

8. 展覽活動：館內有多項特展及校外教學活動、DIY等...

9. 愛心服務：一樓服務台：各項相關資訊 / 活動諮詢 / 顧客意見受理 / 購票處 / 廣播服務。

10. 無障礙空間：全館為無障礙空間，設有行動不便人士及親子專用盥洗室。

11. 場地租借：露台表演區(二樓船艙露台活動空間約260坪)

12. 會議室：本館一樓第二展覽室約可容納60人

13. 停車資訊：旗津漁港附近有免費停車場。

14. Tel：571-6688；Fax：571-0999；

網址：www.mome.org.tw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是一個認識海洋文化活教材的優質場所，具備教育、休閒、娛樂的多種功能，使民眾能更容易親近、認識、愛護我們的海洋環境，並進一步拉近你我與廣闊的海洋之間的距離。還是一個享受心靈極致的海洋美學殿堂，因此，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希望能將這座獨特品味的海洋美學勝地，提供民眾對海洋文化更進一步的體認，藉以發展出鮮活豐富的海洋文化，彰顯海洋城市的意境，使之能在浩瀚廣闊的海洋中昂揚飛躍，進而使民眾樂於「親近海洋、喜歡海洋、保護海洋、開發海洋、利用海洋」。

## 參、台北市『長榮海事博物館』

### 一、博物館址與特色

長榮海事博物館是筆者近年極想造訪的博物館，終於在近日有機會北上並特別安排了4小時的時間，佇足停留在館內一償宿願！長榮海事博物館的設立是「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先生多年來的心願！大家對張先生一生的堅韌不拔、奮鬥不懈、決心毅力與終身學習的風範暨表率是眾所周知的，張先生希望藉由海事博物館闡述張總裁與海洋的深厚情感及推廣台灣的海事與海洋教育；長榮海事博物館位於總統府與立法院附近，為一幢7層樓的建築物，之前是

「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建築物外觀方正大方，內部寬闊、挑高約4米為一十分理想的展覽會館，而且交通十分方便。長榮海事博物館的設立以保存、傳播船舶的歷史、藝術與科學為宗旨，希望喚起民眾對海洋文化的興趣與關懷，進而激發其探索求真的精神。

### 二、展覽館介紹

長榮海事博物館展區可分為『常設展區』，以及不定時替換的『特展區』。目前的「特展區」展出正在展出【海洋新視界--2012世界海洋日特展】及【漁人與海：18世紀法國版畫收藏展】等兩項內容；『常設展區』則分別在(2F)的航海探索區到(5F)的世界船舶區，分別以不同的特性、特點、特質，分層依據各別內容展出，尤其在3樓有二個展區並特別詳述了「台灣的海洋歷史」，現依樓別分別簡介如后：

#### (1)長榮海事博物館一樓大廳(1樓)：

當進入長榮海事博物館的一樓大廳後，首先印入眼簾的是蘭嶼人的彩色捕魚船，旁邊還有



鄭和七下南洋的「鄭和寶船」及傳統的「阿拉伯」商船，此三船並列的設計是為突顯此館的內

涵包括了台灣、中國大陸暨全球視野的三大面向，期使參觀者在「高度、態度、程度」上均



能面面俱到。

一樓除可看見全球與海洋的感性設計外，本層樓尚設有咖啡廳，可提供精緻的咖啡與蛋糕，對想小歇的訪客，提供了溫馨的服務；另外本層樓亦有禮品店，可供遊客購買相關的紀念品，順道一提的是地下一樓亦有一十分大眾化價格的餐廳，在午餐時間(11:00~14:00)，提供精選中、西式簡餐、素餐 且憑長榮海事博物館當日門票票根，用餐享有95折優惠。

## (2)航海探索區 (2樓):

航海探索區利用多年來所蒐藏的各式航儀，透過主題性的展示方式，讓觀眾了解船舶的基本配置與船員航行的相關知識。此區有8個展示



分區分別為：船舶建造、駕駛台/Bridge、航海設備/Navigation Gears、機艙、

船舶通訊、損管滅火與救生、運河、貨櫃場區模型等，每一區均有文字說明、圖例、實體裝備等供訪客詳視端倪。

## (3)海洋畫作區 (3樓//第一區):

海洋畫的起源，是在攝影技術尚未發明前，人們以繪畫的方式將各種海事活動紀錄下來，內容包羅萬象，從戰爭、船難、船賽、歷史事件、捕魚、水上運動、港口風景以及船的肖像等等，風格以寫實自然為主，與一般純粹的創

作藝術有所不同，是一種帶有歷史文獻色彩的繪畫型態。海洋畫通常盛行於海權發達的國家，十七世紀啟始於荷蘭，十八世紀則在英國發揚光大，隨著大英帝國海權的拓展、疆域的快速擴張，十九世紀成為海洋畫的鼎盛時期。

海洋畫作區依照主題內容分成「波瀾壯闊」、「風起雲湧」、「船的禮讚」、「怒海狂濤」、「港灣印象」等多個單元，藉以引領觀眾進入海洋畫作的世界。互大航海時代直至20世紀早期，航海均是十分冒險犯難的事業，不僅需要勇氣、膽識，更需專業知識、創新與全球視野，當然航海也具有神祕感、浪漫等元素，因此航海與藝術也息息相關。再由於19世紀末才發明了「攝影術」，因此早期航海國家的商船隊、艦隊都有隨船畫家隨時作畫以記錄重大航程中的船隻、地貌、海戰等場景；同時各大港口也有許多船舶畫家在港邊，替來往的船隻留下美麗的「船影」，也為歷史留下可見的影像記錄，像紐約、阿姆斯特丹、利物浦、中國廣州、上海等均造就了不同的海洋畫派，為過去數百年的海洋歷史留下了無數的珍貴藝術畫作。

## (4)海洋台灣區 (3樓///第二區):



台灣四面環海，位處西太平洋南北航線交會的中點，在大航海時代

15世紀末迄今21世紀初都一直是各個海洋強國的爭取據點！西元1554年葡萄牙人航經台灣東岸，驚見台灣如此壯麗而稱台灣為「福爾摩沙/Formosa」開始，台灣便躍上了「世界舞台」！

台灣過去40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許多外族如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日本人的統治，因此衍生出了台灣多元的文化與人文特質，特別是荷蘭人及日本人的統治期間，更對台灣影響暨深且遠！在海洋台灣區中本展館以世界史的角度，分5個單元詮釋數百年來台灣及其居民與海洋的關係，希望藉此讓台灣民眾對台灣的歷史，尤其與海洋密不可分的關係能有新的體認。

#### (5)現代輪船區（4樓）：

自從「瓦特」發明蒸汽機造成「工業」革命後，不但世界有了大大的改變並且直接的改變了航海技術的進展！船用「蒸汽」推進系統的使用，徹底改變了海上「風帆」系統的所有概念，船用「蒸汽」推進系統使海洋運輸邁入新的



的里程碑，使船艦的可靠度鉅幅的提昇並將海運的潛力發揮的淋漓盡致！

現代輪船區有系統地展示了20世紀以來普遍使用的各式輪船，展區分為「遠洋客輪」、「現代貨船」，以及「現代軍艦」等三區，不但軍艦類型眾多且製作精緻完美與實體比例適中，

有如走進了海戰歷史的長廊之中！1866年，義大利與奧地利的里薩之役，是史上第一次兩個蒸汽裝甲艦隊的海上會戰，也正式揭開了以機械為動力的軍艦時代，時到今日，現代軍艦不僅配備核子動力、各式飛彈、電子與資訊戰的設備，另有電子導航設備、衛星通訊與各式武器，還搭配航空母艦、艦載飛機及潛艦參與作戰，海戰已成為全方位三度空間的立體戰爭。

#### (6)世界船舶區（5樓）：

世界船舶區介紹船舶從遠古時代演進至19世紀的歷史，展出從數千年前原始簡易的小船到以風帆、機械為動力的各種模型船。此區分為「原始船」、「西洋帆船」、「機械動力船」、「中國/台灣船舶」等區塊，提供了愛好者一個學習與認識世界船舶發展暨沿革的優良環境。

### 三、長榮海事博物館各項相關資訊

1. 長榮海事博物館(EVERGREEN MARITIME MUSEUM )

2. 位置：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5樓

3.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09：00至下午17：00

4. 交通指南：

捷運紅線至「台大醫院」站2號出口下車(步行約5分鐘)；

捷運紅線至「中正紀念堂」站5號或6號出口下車(步行約10分鐘)



5. 票價說明：全票：200元；

優待票：150元(憑學生證購票)

團體票：一般團體票：150元(20人以上一般暨社會團體)；

團體優待票：(20人以上之學校團體、65歲以上長者)

6. 導覽服務：預約導覽：請於一週前預約時段及參觀人數。

7. 定時導覽：每日提供定時導覽活動；20人以上團體於參觀2週前預約。

8. 教育服務：館內亦有場地可供辦理學校教學、社團各項課程、演講、研討會等...

9. 休閒餐飲服務：一樓設有咖啡餐飲服務區和禮品店：

10. Tel：(02)2351-6699；Fax：(02)2391-5178；網址：emm.evergreen.com.tw

## 肆、結語

英國的沃爾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1552年~1618年10月29日)在他與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講述他過去在新大陸的冒險歷程以及觀察西班牙如何在海外殖民貿易上擷取龐大財富的報告裡曾經明白的指出：「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貿易；誰控制了世界貿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最後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Whosoever commands the sea commands the trade; whosoever commands

the trade of the world commands the riches of the world, and consequently the world itself.)，報告裡上述最重要的一段話，可以算是現今海權論形成的雛型與經典之作！

綜觀近數百年西方強權的蹶起，無論從最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到後來的英國及今日的美國莫不將此段文字奉為圭臬並深植在其國家安全政策內！中華民族早期也是海洋的民族，看看「鄭和七下西洋」的歷史暨本文中二個非常棒的「海洋//海事」博物館內所列中國歷代船舶技術的發展亦可印証！只可惜明朝初年實施海禁之後，其後的數百年間中國的海洋科技、海洋發展與海洋經營就開始大幅度的落後西方略強了！中華民族要如何跳躍式的趕上並重新成為海洋大國呢？不二法門就是強化「海洋教育」，站在海防第一線的海軍，海軍第一線的海軍軍官，尤其官校的在校生在畢業前都應該前往筆者所推薦的前二個非常棒的「海洋//海事」博物館內造訪，畢業後若有機會在國外深造或受訓更應利用假日參訪國外的「海洋//海事」博物館及「軍事」博物館，如此必能獲得更多的啟示，也必可為海軍、為國家有更多的供獻！👁️

## 參考文獻

- 1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官網。
- 2 長榮海事博物館官網。

# 前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

著者／陳立中

第60期海軍陸戰隊預備軍官  
現為台南奇美醫院外科醫師

## 壹、前言

在我國台灣高雄的鳳山、左營、岡山三地，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是陸、海、空三軍的搖籃，因為以上三地分別是三個軍種的軍官學校所在地。然而，有項或許會讓不少民眾深覺意外的，乃地緣位置並無海岸線的鳳山，往昔亦曾設立海軍之營區（鄰近營區之旁亦設置有名為「海光」的海軍眷村），初始的編制和名稱當可推溯至日治時期，係由駐台日本海軍所設置的「鳳山無線電信所」。民國34年（1945年），對日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未久，該處基地由我國海軍部隊接收，於沿續使用近約一個甲子的歲月之後，由於國軍推行精實方案，重新調整編制員額，而致原之基地不再做為軍事用途。

日治時代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留傳至今的訊號發射主塔。



嗣後，在民間團體的反映爭取下，原海軍基地於民國93年6月獲得當時的高雄縣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95年3月起，國防部將轉為歷史建築之舊營區委請縣政府代管，縣政府並再委轉高雄縣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管理；96年9月和99年8月，原址和地上建築物群又接續獲得高雄縣政府與行政院文建會核定為「縣定古蹟」與「國定古蹟」。為促進民眾明瞭此一國定古蹟的歷史緣由及文化意涵，同時供作民眾休閒遊憩的好去處，自去（100）年2月起古蹟區已可於假日期間對外開放，不再蒙上閒人勿近的神秘面紗，亦不再散發剛烈威武的嚴肅氣息。

本座原本於日治時期由日本海軍專用之「無線電信所」，於現今文化部前身的文建會審核時，獲准列定為國定古蹟的因由，計有以下四項--

1. 為日治時期大型和完備的無線電信所之一，具高度之特殊性和稀少性，既為軍事發展史上的重要設施，並且擁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
2. 為國際現存極少數的早期無線電信設施類型，雙圓排列型式的收發訊號電塔（亦簡稱為天線）和各種相關建築物、營舍等呈展出獨特的布置，周旁的農地、綠帶以及環形道路、排水溝渠…等，構築成獨樹一幟的地貌紋理和空間景觀，確有寶貴的文化資產價值。



前期磚造中央管制室(第一送信所，又稱大碉堡)，南北兩側之混凝土質坡面建築物。



日治時代，建於無線電信所內的磚造管制室和工廠區(自後方所攝)。



升旗台和綠地區。

3. 其沿革變遷歷程，涵蓋日治時期進行軍事通信之階段、我國海軍沿續使用之無線通訊階段，以及軍情部門、海軍明德訓練班時期從事偵訊和推行教化活動之階段，具備長期性之事蹟，得留作歷史見證。

4. 園區內的部分建築物，諸如早期的磚造「通訊所兼施造工廠」(日文漢字將通訊所寫為「送信所」，一般則是泛稱為「大碉堡」)，輔助通訊用並曾兼作防空高射砲陣地的「小碉堡」，後期以鋼筋混凝土建造的「十字造型通訊電台」，以及各種和電信相關之附屬設施，均具有營造技術上之保存價值。

以往，在民族尊嚴的大義下，對我國而言屬於屈辱傷痕的辛酸變遷，以及異族侵略者在國疆故地內遺存的諸多建設，大家幾皆避略不提。惟在大戰結束、歷經長達68年的冷卻、沈澱後，各界已均能以溫和理性和尊重歷史的態度，重新回顧日治時期台灣所奠植之各種建設，和這些建設在戰亂中遭到轟炸損壞、光復後被接收並修復重用，繼續做為軍事基地或轉作重要工業設施或公用場所之經過。例如，本文下所描述的原「鳳山

無線電信所」，則是在廣續沿用為軍事基地長達59個年頭後，再被核定為古蹟並轉作歷史文化用途。畢竟，這些都是史實的一部分，惟能還原真相、妥善保存具有時代意義的設施，才能忠於歷史、傳承歷史，讓後代民眾明瞭台灣在近代所遭遇到的波折與演變，以及如何擺脫戰亂苦難的歲月，逐步轉向幸福康莊年代的歷程。

位處鳳山東北邊區勝利路旁，由昔日海軍所管轄之「鳳山無線電信所」舊址，在日治時代原本占有廣達27公頃的面積，戰後政府將其外圍約三分之二的原徵收用地釋還原地主，不過仍保留有約8公頃餘的遼闊面積，故而舊址內迄今仍保存著頗為難能可貴的空曠綠地。肇建於將近一個世紀之前的建築物主體與形成的特殊景觀，迄今依然獲致良好的保存，得兼具文化、教育及休閒育樂等多面向之意義。此項保存原貌並移作為文化地景的作法，已獲致社會各界的贊同支持，咸信大多數的高雄市民和國內大眾亦皆樂於見到該處海軍無線電信所舊址，能被完整的保留下來。

## 貳、日治期間，建造「鳳山無線電信所」的特定通訊用途





日治時代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留傳至今的訊號發射塔（遠攝圖）。



水池亭樹。



明德訓練班時期用之教室。

日本自19世紀後葉實施維新運動起，帝國勢力快速擴張，分別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對清)八國聯軍中大捷，不僅得到大片割讓地，並將取得的巨額賠款投注於發展建軍，促成其軍事武力之急遽成長，放眼當時的全球局勢，彷彿是一枝獨秀般的威猛精湛；海軍方面因為獲得挹注而用以製艇造艦的款項遠多於陸軍，故海軍陣容的威盛壯大尤其迅猛精銳，像是如虎添翼般的竄起於世。在20世紀初葉，日本早在對外採取 烈的軍事攻擊行動之前，即萌興進佔中國大陸、染指東南亞的意圖，其海軍部隊不僅增造大量的艦艇、擴充員額兵力，並興建完備的專用通信基地，冀求收到迅速傳達軍令、有效聯絡指揮的功能。

海軍專用的無線電信所便是基於此等企圖而積極擴建，最先建造者乃是位於日本東京葛飾郡、船橋町，在1915年建竣啟用的無線電信所。而始建於1917年並於兩年後、即1919年完工的「鳳山無線電信所」，在日治時期被視為當時日本帝國三大無線電信所之一，規模型態幾皆援照「船橋無線電信所」而建造。另一處電信所則是位於九州西部長崎縣佐世保海軍基地附近、建竣於1921年的「針尾無線電信所」，此三處電信基

地共同構組成彼時日本海軍的縣密通信網。

上述的東京船橋町無線電信所之建造，始於1913年，翌年完成屋舍機房之營建，並即裝置由德國西門子、Telefongen AG等企業產製的通訊設備(德文的telefon相當於英文的telephone，國內常將Telefongen AG譯稱為德律風根公司)。未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因為德、日分屬不同的交戰陣營，所以德籍技師旋即離日歸國，改由日人自行安裝測試。技術高超的日本工程師於1915年7月突破各種障礙，使電信所可成功的與航行於海上的軍艦連通訊息，最遠則可連通至航行於夏威夷海面上的船艦。若是從船橋無線電信所自1915年8月起，已得全面展開和日本海軍艦艇的無線通訊起算，較諸日本和夏威夷之間於1924年時方才推出的民間無線通訊業務，前者提早施行了9年。

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曾導致東京地區的民用電信設施損壞癱瘓，此一緊急期間日本政府曾借用海軍的船橋無線電信所，和橫濱、大阪等地區聯絡，確保無線通訊的順利進行，協助政府即時收發眾多訊息，誠有忒大的功勞。同樣在船橋無

線電信所啟用9年後，日本海軍又於1924年在東京霞關的「海軍部」旁址，興建一處設備愈為新穎的「海軍無線電信所」，但船橋無線電信所在海軍的無線通訊領域，依然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迄1935年，船橋無線電信共建立起19座各有200公尺和60公尺高度的無線發射塔--乃1座高達200公尺的主塔和18座高為60公尺的副塔，儼若船橋地方的地標。

台灣鳳山無線電信所之興建，係參照東京船橋無線電信所的規模而建造，初期安裝的通訊設施亦是「依樣畫葫蘆」般的仿照實施，在1910年代時是屬於最進步的無線電通信先端技術和設備。船橋、鳳山和針尾三個無線電信所，之與日本海軍艦艇的通訊，係劃定有主要的範圍區--船橋電信所是負責與太平洋海面上的軍艦保持連通並掌握其動向；鳳山電信所是連通、控管航行於南海上的日本艦隊(艇)；針尾電信所則是朝西連通航行於東海、黃海等海面上，覬覦我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日本艦隊(艇)。如同東京之船橋電信所早期曾兼任民間電信業務者然，海軍鳳山電信所初告建竣之前數年，亦曾承負連通台灣西南沿海民用船舶的無線通訊，至1925年台灣總督府郵電局另行設置鵝鑾鼻電信所以後始不再兼任，然而迄宣告敗降、撤離台灣為止，日本對於在帛琉海域一帶航行的民用船舶之無線通連，卻一直皆是由鳳山電信所連帶兼任。

20世紀初，所有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當中，幾乎僅日本海軍擁有堅強壯大的艦隊，而得以極其威風的馳騁於太平洋和東海、南海之公海上。而在1930~1940年期間，日本帝國新建的艦隊，不

論是體型、船速、裝甲火力和通訊設備，皆可遠勝於在亞洲殖民已達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歐美諸海權國家，最能象徵壯大國力的航空母艦，不論是數量或總噸數亦皆勝於美國，且其進犯太平洋和大東亞的野心實已昭然若揭。各國雖早已洞悉其意圖而在國際會議如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乃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9年發起設立的國際組織)上通過限制其發展軍備武力，但日本卻悍然退出相關國際組織，對其通過之決議毫不理會。幾告束手無策的舉世諸國，僅能對日本採取軟弱無力的禁運、禁售措施，繼續擴充軍力的日本在和德國、義大利結盟為「軸心國」後，已不再掩飾其侵略的意圖，在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義下，掀起了太平洋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年12月8日(亞洲國家時間)，由總計配置有300餘架飛機的6艘航空母艦和其他眾多軍艦，共同組成的日本海軍艦隊航行至逼近夏威夷之海域後，所接到自海軍部傳達的轟炸珍珠港密電命令，便是經由船橋無線電信基地所發出的無線訊號，而其密語乃是「登上新高山」。密電中的新高山，其實正是台灣的「玉山」，蓋日本在佔領台灣後發現到玉山竟然高於其本土的富士山，遂將玉山另稱為新高山，孰料卻成為日本海軍從船橋無線電信基地發送出去，用以偷襲珍珠港內美軍艦隊的密電。之後，接獲無線密電的艦隊司令--南雲忠一中將，旋按海軍部的指示，於當日清晨下令出動航空部隊轟炸珍珠港，其航空部隊展開攻擊行動前由航隊指揮官--淵田美津中佐發出的密語口令則是「虎、虎、虎」，意為若似老虎一般的勇猛。珍珠港在日本海軍暨其航空部隊



建於日治時代無線電信所之RC結構通訊管制室(即第二送信所，又稱十字電台)



行政辦公室和禮堂(中正堂)。



日治時代無線電信所內部，輔助通訊用的小碉堡，今已於周邊滿植高大樹木。

的偷襲下，自然是被轟炸得面目全非，導致美國對日本和軸心國家的宣戰，二次世界大戰於焉爆發。

因為偷襲珍珠港而開啟二次世界大戰之序幕後，早即俟機而動的日本立即派出大批武力，分別從日本本土和台灣出發，企圖進據中南半島和南海。其艦隊在駛過台灣周旁海域而往南海疾馳而去後，海軍部門即是透過鳳山的無線電信所和日本的南海艦隊緊密聯繫，並嚴密掌控艦隊行蹤，在為期短暫的一、二個月之內，日軍便席捲東南亞，甚且進逼至南亞和印度洋一帶。其中由英國海軍所擁有，號稱是船堅砲利、無堅不摧的「威爾斯親王號」(HMS Prince of Wales)，卻是居先於1941年12月10日、即日軍偷襲珍珠港的隔兩日，遭到日本海軍艦隊擊沈<sup>1</sup>，大不列顛的國勢宛如是紙老虎一般的癱軟不振。

緊接著，由陸軍大將--山下奉文(後來有「馬來之虎」的惡名)指揮的機械化部隊在1942年1月，即攻佔了馬來半島，接續又迅速揮師渡過柔佛海峽，於2月15日華裔民眾準備歡度農曆年的除夕之前便攻陷新加坡，逼令駐防於新加坡的英軍部隊棄械投降，使得日本帝國的氣燄達到猛烈頂旺的地步。該一時期的日本帝國之能有此猛烈

的氣勢，固然是長期整軍經武、擴展軍力所奠基的深湛基礎，但是其舉國經濟實力雄厚、科技進步昌明亦是關鍵因素。海軍部門藉以傳達指令、調動艦隊的無線電信所，在整體征戰過程中亦是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就遭受日軍荼害的國家觀之，日本海軍的無線電信所乃是「助紂為虐」的場址設施，諸無線電信所在戰後各有不同的際遇處境。像是東京的船橋無線電信所，在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即由進駐日本的美軍接管，1966年始交還由戰後成立的日本自衛隊接管。因為包含發射塔在內的諸多電信設施，在大戰末期曾遭到盟軍的猛烈轟炸而難以繼續使用，因此包含原係屬於地標建築物之發射塔在內的眾多設施，遂在1971年時由日方鳩工拆除，拆除工程自當年5月展開，隔年便告完工。再者，該電信所駐在地的船橋地方，更因行政編制的重劃，而於日後改隸於東京東旁的千葉縣(而東京、橫濱共同形成一處海灣)，成為新設的船橋市，不再屬於東京了。

台灣的鳳山無線電信所，由於當時是位處鄉間綠地，兼以設施建構得十分穩固且屏蔽良好，所以在大戰後期並未遭致慘烈的轟炸破壞，戰後仍



得由我國海軍接收沿用。雖然，諸多矗立於外圍環廓的訊號收發電塔，在戰後陸續被拆除，附近土地亦歸還原地主，但是仍保存著殘留的座墩可供溯查，電信所圍牆內的電塔和各控制室，則皆近乎完好的留存，一直到本世紀初停止其原有的軍事用途時仍都處於堪用狀態，若干損壞部位大都是屬於自然狀態的折舊。因此迄今，昔之鳳山無線電信所乃是全世界建於20世紀初期，而能夠整體留存至現在、是極罕見的歷史性電信場址，設若排除其屬於過去肆行侵略之日本帝國所興建的陰影，確實是屬於軍事武備和歷史文化上的寶貴資產。

## 參、在「無線電信所」時期，由日本海軍部門所建造的相關建築物

在建築基地的規劃上，於1917年動工興建的鳳山無線電信所之本體、即「中央管制室」，為一座呈東北-西南方向的「三連拱」對稱造型建築體，自空中俯瞰有如一具「大啞鈴」、另亦被泛稱為「大碉堡」，每一「拱室」為一個單獨的大跨間，並劃設有為數眾多的管制室和施造工廠。各管制室皆有其負責連通、控管海面軍艦的海域範圍，並有布設的專用線路連接至收發訊號的電塔。因為鳳山地方長年溫暖炎熱，在尚無舒適冷氣得供吹拂送爽的年代，建築師在設計整棟大型建築物的外體並分隔內部的工作室時，係採用開設多片氣窗與關鑿通風口的原理，以促進空氣對流的方式，達到自然通風、涼爽沁人的效果，使得整座以鋼骨水泥構築的挑高屋頂和梁柱、並以磚塊築砌成牆壁的中央管制室，如同具有現今的

中央空調系統一般，在內部任職之人員俱可在良好的工作環境下，達成和海面艦艇通聯、管制訊息的任務。另則基於安全防護上的需求，其四周的門窗皆採用「防爆門窗」的款型，即以鋼構框架填塞高強度的混凝土，這在1910～1940年代當屬極具巧思和實用功能的工程技術。

本座狀似大碉堡的中央管制室，呈對稱狀分立於兩側的「大跨屋間」，每個跨間的縱深達35公尺，相當的宏偉壯觀，屋頂上有厚層覆土並植草，如同「屋頂草原」，可形成綠色覆蔽，防止偵察機的偵測和轟炸機的投彈，平時亦可避免屋頂受到豔陽的照射聚熱而導致內部的悶悶，砌造牆面的磚塊是產自高雄中部的磚廠（位於今鼓山區中華橫路與九如三路附近）。每一跨間的南、北兩翼係呈斜坡形式，從地面漸往屋頂高處延伸接合，經由詳細比對後當可知悉，東側跨間設計有較多的梁柱，得強固支撐上方的樓板和承載的設備重物；西側跨間的梁柱雖然較少卻相對較粗，蓋當側主要為裝建大型柴油發電機俾可產生動力的發電廠，和製造、裝配零組件的施造工



昔海軍鳳山電信所之通信副塔和繫固座墩，分為A圈及B圈兩圈；A圈共有18座副塔、直徑為680公尺；B圈共有36具座墩、直徑則為800公尺（載自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廠，必須有更加寬敞的空間且梁柱須能承負架設於上方的吊車(國內俗稱為「天車」)；連結東、西兩個主跨間的「中央跨間」，係分為三個樓層，最上層是指揮官室和辦公室、會議室，中層為通連管制室和調度室，底層主要為庫房，因為中央跨間的各層樓板所放置的器物設備，顯較兩側跨間處為輕，所以是以木板來架隔成樓板，但另填置有吸震材料，以防止人員走動時帶來聲響。

1920年代起，日本的「南進」軍事武略愈發猖狂，雖然尚未和斯時殖民於東南亞的英、法、荷…等歐洲列強產生正面衝突，但已頻有派遣艦隊遠赴當地試探挑釁的動作，且趁多國或各殖民勢力兵力未逮、自顧不暇之際，逐步奪佔中南半島沿岸地帶並竊占散布於南海的諸多群島、離島。後來，由於鳳山無線電信所必須和不斷增多的船艦保持通連，前述既建的「中央管制室」已不敷使用，遂於中央管制室東南方約100公尺之處，另行闢地並以強化的鋼筋混凝土為建材，興建一座愈為精良進步的通連管制室，此在該時的名稱是鳳山無線電信所內的「第二送信所」，而原之中央管制室則又稱為「第一送信所」，彼此負責連通的區域亦相互區隔，各別行事。

因為該座於後期建造的管制室是呈十字型體，故在日後被我國接收後係稱作為「十字電台」。第二送信所、即十字電台內部的電力設備和布線方式，當然是較第一送信所改進甚多，線路均是集裝於纜線溝槽內，集線器和電力用的分電盤乃是採用三菱重工業新製的機型；而且，十字型體電台內，同樣兼設有工廠並有吊載能力更大的起重吊車，惟因開設的門窗已經顯較減少，故於內

部裝置有巨型鼓風機以增加通風效能。此外，為求著收更佳的防爆功效，人員進出的門體皆是以厚重鋼板鉚焊製成的「防爆門」型式，且類似軍艦上的水密性門窗，必須藉由轉動圓形操作盤才能開啟閉合，屋頂亦如第一送信所者然而覆以綠色植被，即使敵機臨空鳥瞰，亦屢因其形體若與周圍樹林、草地融為一體而難以辨識。職是之故，十字電台有如一座固若金湯的堡壘，得堅定穩固的發揮和遠在千里之外的艦艇船舶，進行長程通連的效益。

相對於原之中央管制室，日後改稱第一送信所、而且被泛稱為「大碉堡」的核心建築物，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後來又於距離大碉堡約250公尺，但和主電塔相距僅約75公尺處，增建一座亦是作為通訊管制用途，但形體遠比大碉堡為小的小碉堡，乃輔助大碉堡以從事無線通訊的另一座增建場址。小碉堡內部之空間呈現長方形的形狀，係專責於主電塔所收發無線訊號之處理管制，且因為主電塔高度遠高於其餘的18座副塔，故其管制室內所能通連的海面船艦，在相隔距離方面尤遠於大碉堡者，即可與遠在南海、屬「海上最前線」的軍艦即時連通。另外，小碉堡周邊裝設有四道防爆門，比諸大碉堡內的安全防護措施，乃有過之而無不及；其頂緣和周旁則遍植有樹木作為掩護，迄今小碉堡上方的坡面和周邊環帶，已經滿植高大樹木，遊客若不仔細尋找，還真容易錯過。

架設並高聳於電信所周旁、用以收發訊息的電塔，是第一送信所(即中央管制室或大碉堡)和第二送信所(即十字電台)以外，最重要的設施，亦

是最具保存價值的文化資產。平素無法進入無線電信所內部的民眾，從遠處所能眺望得到的，即是這些以雙層圓環型式所排列，尖突聳立於地面之上的電塔。在1917～1938年間、亦即從日治時代中期以至晚期的21載之中，鳳山無線電信所盡乎是比照東京的船橋無線電信所一樣的，在數度期程的擴建下，總共築建了1座200公尺高的主塔以及18座高60公尺的副塔，望之煞像是「電塔森林」，是那一陣子全台灣僅有的獨特景致。每座通信電塔的基座，均是長400公分、寬250公分並高出地面112公分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即使18座的副塔已被次第拆除，但若干基座仍存有殘跡顯露於地面上。

矗立於電信所圍牆內區域，近乎是中心位置的通信主電塔，深入地底的部分即約20公尺，且還由周旁的三具座墩共同拉繫，使能牢固錨定於地面上，三具繫固座墩皆和主電塔相距150公尺，即位於同一個直徑為300公尺之圓形的三個等分點上；與主電塔距離340公尺處的圓形環帶，則坐落有18座、60公尺高的副電塔，亦是以同等間距分布於一個直徑達680公尺之圓形上，每座副塔除了自身有達6公尺深的地底部分外，並各有兩具繫固座墩以加強副塔之穩固，這些總數為36具的副塔繫固座墩，是等間距的分布於一個直徑800公尺的圓形環帶，詳如附圖，乃以紅點標示於解密之空照圖上，讀者若參照圖面上的標示位置作比對，當可一目了然。

前鳳山無線電信所之基地，在最主要並區分為第一送信所和第二送信所的通訊管制室，以及19座主副電塔、39座繫固座墩之外，並建造有訓

練講習室、戊衛室和軍官宿舍、士官兵寢室、圓形水塔以及圍牆等，由於未如通訊管制室或主、副電塔那般的特殊，故不再逐一列述。倒是其中以紅磚砌造、內部塗布水泥和防滲材料的水塔，有近約10公尺的高度，塔身四周稍向中心軸線內傾，故不致於朝外崩坍，但是卻又為了預防塔身上方的貯水槽因為裝水過重而坍塌，所以特別在塔內砌建有「格子梁」和另以磚塊砌造的托架當作支 ；且若端詳水塔外圍，可見到皆是以紅磚的短邊順著圓弧以施作的「丁砌面」，工法細膩而老練。

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軍曾於電信所基地內的若干高點，架設高射砲作為防空陣地，但是因為基地若似隱身於一片廣大的綠地樹林內，所以鮮少被盟軍戰機發現而遭到轟炸掃射。比起當時不遠處的高雄港埠碼頭、海軍左營基地、海軍小港機場或陸軍屏東機場，電信所基地乃是安全得多，防空高射砲開火的次數倒也不多，戰後這些高射砲則被拆卸移除，今已不復存在。

## 肆、日本戰敗撤離後，本處軍事基地的產權移轉和變更使用

這座由日本海軍工兵營建部隊建構的鳳山無線電信所，自1919年落成啟用而至1945年日本投降停用為止，總計由其海軍使用長達26年之久，對於日本海軍駐台指揮部經由傳收無線訊息，機動調度巡行於南海廣袤水域的日軍艦隊，必有相當程度的作用，也帶予日方極其豐碩的征戰掠奪成果。然而，肆意舉兵侵略終有潰渙敗降之日，1945年8月15日裕仁日皇所公開播放的《停戰詔



書》，駐台日本海軍正是透過鳳山的無線電信所，將日皇下達無條件投降的宣告，傳送予遠在東南亞的所有日籍海軍官兵受命，令其結束侵略惡行。接之而來，關於對此座無線電信所的處置方式，即是準備將移交予我中華民國海軍接收。

雖然在日軍敗降之際，留守於電信所內的駐軍，火速銷毀各類機密書冊、敏感文件，並拆解在當時極為先端進步的通訊設備，僅留存建築物和粗重老舊的機具以待日後的交接清點，但是國軍部隊依據留存的資料仍可推判出鳳山電信所往昔的運作概況，並秉持克難精神暨傑出智慧以傾力修護留下的設備，繼續使用經過維修保養後的堪用機具，待日後財力狀況不再拮据吃緊，方才逐年編列經費予以汰換更新。至於日軍留下的建築物方面，因為本即建造得十分堅固，且在交接前日軍並未明目張膽的刻意炸毀破壞，所以得供保留續用，直到民國93年9月海軍停止使用斯座基地，並由當時之地方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為止，皆未從事過重大的翻建改造，僅曾就若干之處進行修繕葺造。

台灣光復後，前鳳山無線電信所由我國海軍接管，先做為通訊大隊分遣隊駐地，亦曾短暫撥借部分用地和建物予軍事情報部門兼作偵訊嫌犯之場址，為避免刺激起見平日官兵大都改用「招待所」的名稱來稱喚，而原本用於無線連通訊息的「大碉堡」則充作拘留嫌犯的場所，後因軍情部門另行購建專屬的新址，遂將借用地歸還海軍，轉由海軍政戰部門管理。民國51年，除了原之「十字電台」和周旁腹地仍供作通訊用途以外，海軍政戰單位先在此處設立訓導中心，從事將近

8年的部隊維安保固工作；過後，則於民國63年7月成立海軍明德訓練班，並交由海軍陸戰隊轄下單位擔任輔訓職務，教化管束經由部隊提報或經過軍法判決，亟待矯正品行的收容人。

此段時期，通訊用地和訓練收容學員的用地，係以圍牆隔開，並曾視需要添建新房舍和各類附屬建築如警備室、官兵宿舍和菸毒勒戒室…等。坦言之，在後續階段由國軍部門運用有限經費添建的房屋舍室僅係著重於實用性，而並未著眼於風格造型，因而較為平淡無奇，與日治時期留存的建築物顯有區別，得被輕易的分辨出來。例如，磚造的日式宿舍是以木梁構組成「二重梁」的格式，壁面常可見到以木板疊置成的「魚鱗板」造型(上層的木板會疊蓋住下層木板約1/4之部分，如同魚鱗的疊組，可防止雨水潑進屋內，又稱雨淋板)，特別是其醫護病患的診療室，在磚砌立面上方更設計有可增益美感的「楣梁」和促進通風的「花窗」，尤較一般的宿舍美麗脫俗；至於國軍添建的宿舍則是以鋼筋水泥為柱、磚塊塗布水泥為壁，地面亦抹覆水泥或磨石處理，旨在講求實務效用，無需特別講究砌築架梁的工法，而可以在較短的期間內迅速完成。

81年3月，斯座基地改由海軍總部直接管理，並漸將明德訓練班的學員遷往他處；90年後由於國軍精實方案的推行，以致曾長期駐守於基地內的通訊大隊分遣隊必須調整編制，並且鑒於使用多年的通訊設施已趨老舊，難以續用，因而通訊單位遂遷離此地。閒置的建築和設備，曾暫供定期參與國防部三軍聯合訓練的指揮部，於執行任務期間使用，不過為期尚不到3年便在93年初完

全停止軍事用途，同年6月在既經登錄為歷史建築後轉為文化資產。

2008年10月，在一次由行政院文建會指導，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暨高雄縣政府聯合主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陸軍軍官學校、正修科技大學建築系和南華大學建築景觀環境研究所等機構院校共同協辦，並假高雄召開、為期4天的「台灣日治時期軍事設施部署、設計及再利用研討會」中，跨海蒞臨與會的日、美籍軍事專家如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部教授原剛、近畿大學教授岡田昌彰，和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設施安全研究中心講座教授Krauthammer等人，在正修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顧超光先生引領下，親赴前鳳山無線電信所造訪，察看該座曾經與東京船橋無線電信所齊名，且曾經是20世紀初葉同屬舉世最精良完備的軍用電信所的留存風貌，亦對其所遺存至今，極為堅固宏偉的建築物頗覺讚賞驚奇。

移駕光臨的學者們，莫不深嘆當時的日本帝國，不但軍事武力堅強壯大，在營建、機電諸多科技領域亦咸能夠領先各國，惜乎竟用於惡途，非但未能造福寰宇群倫，反倒在舉世掀起波瀾，肇致的禍害迄今猶在多處亞洲領域遺留爭端。像是從東亞北端鄂霍次克海，一直到遠在迢迢南方的南海，長久以來由昔日之日本帝國所遺留並引發多國爭議的群島、列島或單獨島嶼主權問題，便是由於其在帝國稱霸時期，胡亂侵略所引致而長留至今的遺害，對我國主權的侵害尤遠深於其他的東亞或東南亞國家。

相較於船橋無線電信今已不復存在，針尾電信所屋舍無存、場地移作他用而僅殘留三座電塔

的慘澹狀況，昔屬日本帝國佔領地的台灣，境內之鳳山無線電信所遺址，反而是保存得最為完整者，也極具珍貴的歷史文化意義。台灣在過去的日治軍國主義年代，無線電信所為重要且甚具機密性的軍事基地，民眾只要逗留於附近或稍為停下張望，便會遭到為戍守衛兵的驅趕，今則可於假日入內自由觀訪拍照，誠非過往年代所能預料之事。不過，現在已是歷史建築和國定古蹟的前鳳山無線電信所，畢竟曾是侵略者逞其奪取意志而建造的通訊基地，因此不少國人尤其是年紀較長、往昔曾遭到日軍荼害者，在參訪本處古蹟區時，難免會勾起不堪回首之傷痛，而非僅以好奇興奮之心境入內參觀瀏覽，國人並應惦記歷史教訓，常保強盛的國力，避免重蹈遭致異國強權入侵迫害的歷史覆轍。

### 伍、民國90年代，因國軍推行精實方案，原通訊基地移作文資用途，並經評定為國定古蹟

自民國93年後，因業務的精簡固實而致原駐防上述基地之部隊遷離原址，基地停止使用後有一陣子是全面關閉深鎖，偶而才有人員前往整理環境，修剪樹林草地。相對於前無線電信所，鄰近老舊眷村已由國防部依據眷村改建條例和施行細則陸續推案整地，改建為新式的集合住宅大樓，此座仍佔有逾8公頃土地的原軍事基地卻任其閒置停用，不僅十分可惜亦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亟待活化使用以展現最佳化的整體功能。經過民眾的反映和鍥而不捨的奔走努力，以及海軍各級部門暨國防部的寬大考量，終於在此方面有

了新的突破和轉機。

原本門禁森嚴、帶著神秘色彩的該座基地，因為已有將近百年的悠久歷史，蘊涵許多幽轉折的沿革變遷，兼具各種興衰榮辱的遞嬗事跡，且夾含著當代獨特建築藝術和引領時代風潮的無線通信技術。幸而歷經地方文史藝術團體、人士的積極爭取，遂在民國96～99年間，先後經地方政府暨中央部會審定並公告為「縣定古蹟」與「國定古蹟」，讓本來大都是秘而不宣的史實軼事，得以公開展現於世人面前，鳳山地方的鄉梓耆老尤感欣慰。甚至原本對於往昔日本帝國黷武侵略罪行，長期痛憤、永生難忘的眷村居民，以及由居民們組成的「眷村文化發展協會」，亦樂見這座基地轉作為文化古蹟，俾既可保留下珍貴的文史資產，並可成為歷史、軍史上的永世見證。

在民國96年，基地尚屬高雄縣縣定古蹟之階段，縣政府係委託高雄縣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管理維護；俟99年基地被公告為國定古蹟且高雄市、縣合併為單一直轄市後，高雄市文化局曾以中央部會撥付的款項和自行編列的經費，在專業人士指導監督下雇工整修，同時委付鳳山地方的眷村文化協會代為管理。自2011年3月起，於每週的星期六、日對外開放，供民眾入內參觀；因為前往參訪的人數猶非甚眾，所以尚未施行總量管制，亦因限於經費、人力，故也尚未施行導覽機制或安裝時下極為常見的語音播放設施，不過若是組團前往且經過預約申請，經由眷村文化協會審查同意，則會編排人員或志工擔任導覽解說，讓文化界或特定團體的成員們，於造訪這座國定古蹟之後，咸皆能得到鮮明豐碩的收穫。

目前，眷村文化協會招募有10餘名、多半為海軍陸戰隊退伍的官兵弟兄擔任志工，輪流巡查守護此片舊日基地。不過，基於人手尚告不足難以肩負夜間巡視的任務，協會已向政府申請撥置若干替代役兵員額數，在固定時段輪班巡邏或於非特定時段機動巡邏，以加強守護園址之重任，同時提報請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考量增裝監視器，遏止歹徒宵小的侵入偷竊。

舊日的海軍通訊基地和明德訓練班場址，在停止使用後轉作為文化用途，自然是極佳的好事，但在產權的維護上則需顧及所有人原有的權益，甫能切合於整體的公義性。針對此事，國防部曾表示前海軍明德訓練班坐落鳳山區埤頂段1243-70等7筆土地，原屬機關用地並列於專案核定作為變產置產的不動產。以上土地，經於99年依程序公告為國定古蹟所在地後至今，當前是由高雄市政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代為管理，應由高雄市政府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之規定，辦理有償撥用，以符「管用合一」目標。如是為之，方才周到允當，並盡符依法行政的作為。

## 陸、已公告為國定古蹟的前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得藉由「眷村文化節」的活動而愈加廣為周知

自民國80年代後期起，國防部逐步推行精實方案，國內部分軍事基地因為人員縮減、單位裁撤而停止使用。而由前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暨曾是海軍通訊大隊分遣隊駐地、海軍明德訓練班所在地，所轉型化身的國定古蹟，是全台灣



極少見的軍事風貌古蹟。綜觀合併改制後的高雄市，現今行政區內在民國86年4月以前，經公告為一級古蹟者有「鳳山縣舊城(北門、東門、南門)」(該座建於清朝的鳳山縣舊城門，實係位於今之左營區興隆段)；86年4月之後，公告的國定古蹟計有「台灣煉瓦會社打狗工場」(位於高雄市三民區中華橫路，民眾常簡稱為中都磚窰場)、「鳳山龍山寺」(位於鳳山區中山路)、竹仔門電廠(位於今美濃區龍肚里附近)；而本文描述的「高雄無線電信所」則是於99年明定公告。但是，該座在時序上最晚被納入為現今高雄市內一級古蹟或國定古蹟的無線電信所，卻是高雄地區唯一建於日治期間的軍事古蹟，與前所列屬於「城廓」或「寺廟」或「產業設施」的諸國定古蹟炯然有別，透過其遺存建築物的型態風格，訪客可溯知20世紀前半葉鳳山地區的海軍無線通訊概況和相關的軍事情勢、社會背景，並可綻開另番鑒古知今的眼界和心境，萌興刻苦耐勞、力求精進的信念及淬勵奮發、堅毅卓絕的情操。

在鳳山地區，原本環繞前海軍無線電信所的數座老舊眷村次第改建後，昔日有「竹籬笆、紅門戶」之稱的舊式眷村已逐漸不存，當地居民則對於前無線電信所的特殊歷史意義和眷村的往日風情備感懷念。在眷村風情日趨微後，由曾經長居高雄地區之眷村住戶們，共同發起成立的「眷村文化發展協會」及選定於每年10月間辦理活動的「眷村文化節」，反倒深受出身眷村之諸多人士認同接受。近幾年來，眷村文化團體果皆依照設立之章程，固定於每年10月舉辦慶祝儀式，象徵眷村精誠團結意念的永續沿傳。

2011年10月22～23日的高雄眷村文化節，便是分別在左營的眷村文化館和鳳山的前日本海軍無線電信所推出系列活動，乃繼上一年度在左營和鳳山聯合辦理「萬年季」(紀念昔日明鄭王朝曾於左營設立「萬年縣」，但據歷史界的考證昔之萬年縣應在今之台南仁德)與「鳳邑新舊雙城會」(左營曾是鳳山縣舊縣址所在地)之後，再次上演之另類雙城會。前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周旁，原有海光四村、莒光三村、光華新村和工協新村…等眷村，因此在當處舉辦眷村文化節的活動，確有地緣之宜，活動內容以輕鬆活潑的氣韻，傳揚擴展眷村文化中首要的團結愛國意涵，深民眾的肯定和好評。而前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的知名度，則得藉由「眷村文化節」的活動，而愈加的廣為周知，讓其不僅逐漸成為國人得以知其緣由典故的國定古蹟，並且是永世見證歷史的寶貴遺址。👁️

1 於1941年初，在戰亂中趕工建竣於利物浦的「威爾斯親王號」戰艦，是英國皇家海軍「英王喬治五世」級戰艦的二號艦，服役未久即於5月分與胡德號戰鬥巡洋艦一起投入截擊德國俾斯麥號戰艦的行動。1941年11月25日，接獲緊急情報的英方，下令由菲利普斯中將率領的威爾斯親王號旗艦，與由4艘驅逐艦--伊萊克特拉號、快速號、忒涅多斯號和隸屬皇家澳大利亞海軍的吸血鬼號，以及反擊號戰鬥巡洋艦共同組成的艦隊，火速趕赴南海，準備攔截意圖不軌的日本艦隊。在爆發珍珠港事件後的12月9～10日，銜命巡行殲敵的英方艦隊並未發現到日本艦隊，卻在返航時反被日方潛艇發現行蹤，並即通報日本占駐於越南西貢的海軍部門；接著，在未有空中掩護之局勢下，威爾斯親王號和反擊號被自西貢起飛的86架日本海軍戰機擊沉，使原本號稱是日不落國的不列顛遠征艦隊倏然瓦解。後續之接戰，英國海軍只能採取守勢防止日本艦隊朝新加坡挺進，孰料日本卻改由陸軍部隊自馬來半島南下，一舉奪佔新加坡。

在此之前，軍界大都認為必須仰賴船體愈堅、砲火愈強以及布陣列隊戰技愈佳的艦隊，方可有效殲滅敵方戰艦或艦隊。但是在1941年12月，日軍接連派出海軍航空部隊摧毀珍珠港內的多艘美國戰艦，以及在南海炸沉英國海軍的威爾斯親王號等戰艦後，軍事專家方才省悟「以機炸艦」較諸「以艦艦」愈為直接有效，嗣後在中途島海戰即有最強烈的印證。今日，則是發展至以導航飛彈或魚雷來攻擊，又已遠非數十年前所能想像。

# 全民國防之構思與落實

著者／蔡金倉

空軍指揮參謀學院98年班  
現任空軍作戰管制聯隊中校副主任

全民國防不等於「兵民合一」或「全民皆兵」。「國防」是政府的職能之一，用以確保國家與人民不受到外來的威脅與侵犯。因此，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的範疇已由傳統的軍事安全，擴及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等綜合性安全趨向。為使全體國人能夠理解國防安全的內涵，具備「國防安全人人有關，國防建設人人有責」的認知，形成「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的全民國防共識。

## 壹、前言

清末民初之際，遭受「八國聯軍」入侵，因而產生「軍國民教育」思潮，對日抗戰期間，首先提出「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以空間換取時間，與日寇作殊死鬥，終於使敵人陷入泥沼而難以自拔，得到勝利，其實就是「全民國防」構思最好註解與成功案例。

全民國防一詞正式出現官方文獻為1992年「國防報告書」中前國防部長陳履安在序言中表示：「現代國防為全民國防，需要獲得全體國人的支持，才能發揮整體的力量，達到保障國家安全的目的。促使國民全力支持國防最根本方法就是溝通、瞭解產生共識」。該書在「國防政策篇」國防與總動員中提到「現代國防為全民國防，人人有責。此一共識之建立，為當前國防建設之要務」。為進一步推動全民國防的觀念，國防部

每兩年發布乙次「國防報告書」，使國民對國防事務益加關心，有賴全民共同支持。1996年推動「精實案」，在當年「國防報告書」將全民國防納入我國現階段國防政策之一，置重點發展全民國防，激勵全民精神意志，落實國防與民生合一，平時廣儲戰力於民間，戰時迅速動員統合民間力量，確保國家安全。2003年啟動「精進案」，更須結合全民國防理念，積極推動全民國防相關作為。「全民國防教育法」於2005年2月2日施行。2010年教育部與國防部訂定「各級學校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

如何將全民國防的理念深植國民心理，各項動員準備融入於平時與戰時，並瞭解當前我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挑戰與威脅，藉由瑞士、以色列、美國的全民國防為例証，探討全民國防之構思與落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由此顯示，施行全民國防政策，是基於國家安全的需求，在當前我國國防政策前題下，具有公共的特性，國防是國家安全的保障，而國家為確保生存與發展，透過政治、經濟、軍事、心理戰、外交、科技等作為，如此一來，國防即無法再被侷限於國家、政府統治行為，而必須與全國國民發生密切連結與互動，開放全國國民對國防參與以共同達成國防目的，成為重要之國防政策。

## 貳、各國推動全民國防背景與現況

### 一、國防與全民之關係

#### （一）國防與公共政策之關係

全民國防政策係屬於公共政策的一環，同時具有教育政策的實質內涵。公共政策，通常在謀求公共問題的解決，規範和指導有關機構、團體或個人的行動，在廣泛的參與下所制定的行為準則。教育政策則是在於適應教育的需求而提出相應的策略。學者顏國樑曾引用Hargrove的研究指出：全民國防教育政策執行必須兼顧公共政策執行與教育政策執行二者之內涵，才有可能有效達成政策目標，當政策合法化後，執行活動即開始，須有確定推動政策方案的機關，結合各種資源，採取適當的執行法。

#### （二）國防與全民之關係

全民國防不等於「兵民合一」或「全民皆兵」。「國防」是政府的職能之一，用以確保國家與人民不受到外來的威脅與侵犯。因此，「國防」可視為具「非敵對性」（non-rivalry）、「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擁

擠性」（congestion）和「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的「純公共財」（pure public goods）。因為獲得國防的好處是不分貴賤貧富，無法排除範圍內的任何使用者、所以「國防」的提供與受益一直都存在著「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及「搭便車」（free ride）的現象；正常情況下，私部門或個人並沒有能力和意願、也不容易提供「國防」的服務。「國防」作為一種不易由私人提供或市場機制產出的公共財，且由政府專責規劃、執行的行政權力。

#### （三）全民國防具體意義

「全民國防」一詞在我國國防報告書中譯為（All Out Defense），包含了全民防衛（civil defense）、民防（people's defense）概念。全民國防用以涵括達成國防目的之範圍與列舉可予採用之政策工具，包括了傳統的軍事武力、動員防衛及與國防相關的各種措施，並刻意強調對國民參與國防事務的期待。整體而言，全民國防是透過民間的共同參與，以「正面活動」配合國家軍事力量，在經濟防衛、社會防衛、心理防衛等建設性層面，維護國家安全；簡言之，全民國防是動員全民力量完成防衛國家之任務。

#### （四）全民國防代表意涵

將「全民國防」之意涵拆解為「全民」與「國防」兩個部分，前者指的是這種戰爭準備的一種型態或方式，後者指的是戰爭準備；就字義而言，「全民」即全體人民，但具體而言應是集體意志及「行動」的一群人民，國家匯集群體人民共同的認知、意志和行動，展現在面對外來威脅的一種國防機制。「國防」就是國家防禦外敵攻



擊的簡稱，就內涵而言，國防是國家為保衛其領土、人民、主權的安全，所採取的一種戰爭準備。

## 二、各國推動全民國防之背景

### （一）國防代表安全思維

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建構國家安全環境所需的國防政策，特別強調必須掌握國際或國內政經情勢及其互動關係，並對其所產生威脅，以國內或國家環境加以回應。世界各國在綜合安全思維下，建構全民國防的發展趨勢，以建置能夠先期有效嚇阻敵人不當企圖的全民國防統合力量為經，並能適時執行必要防衛手段聯合軍事行動的力量為緯，在經緯緊密結合中，提供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所需安全環境，以及提供處理安全環境及國家危機的戰略思維。

### （二）戰場環境改變

冷戰結束後，國際安全上原本所面對內外挑戰與威脅，趨向多元化。美軍在1991年波灣戰爭中運用電子、資訊、通信、網路等高科技武器，將戰爭系統化，讓世人見識到高科技武器主宰戰場，迫使世界各國加快軍事現代化，亦使全球在「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思潮衝擊下，成為各國建軍備戰重要方向。各國均採行精兵及募兵併行趨勢，企圖提高人員素質，施行全民國防，以適應未來發展之需要。

## 三、各國推動全民國防之現況

### （一）瑞士

1. 全民國防觀念：地處中歐腹地的瑞士是一個

小國，人口600萬，軍隊僅4萬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中立國。100多年來，處兩次世界大戰皆能安穩的度過，不能不歸功於「總體防禦」全民動員效率的傑出、完備的民防制度及終身國民教育培育出的全民國防意識。在瑞士，公民的國防觀念相當強，公民例行參加各種形式的軍事訓練，並積極交納國防稅，主動參與和支持國防建設。1885年，瑞士實行軍隊體制改革，確立了全民皆兵的制度，此後一直採用普遍義務兵役制。瑞士一直保持全民皆兵、全民動員的民兵制軍隊。

2. 完備民防體系：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民防建設並非一朝一夕和一勞永逸之事，只要有戰爭威脅存在，就不能忽視民防建設，必須將民防建設納入國家總體規劃。自1962年2月聯邦政府根據憲法規定，頒布了「聯邦民防法」（Federal Law of Civil Protection）、1963年通過「建築物避難設施法」（Federal Law on Building Measures）、實施以來，不僅已建立起極有效率的聯邦民防決策，以及州、鎮各級民防組織和民防部隊，並且為了逐步建立民防建設，該國將民防設施的建立納入整體國家規畫，計610萬個掩蔽設施，足可容納全國90%的人口。

### （二）以色列

1. 全民皆兵運作體系：以色列面對周圍充滿敵意的阿拉伯國家，始終處於戰爭危險之中。以色列全民皆兵體系，乃是憑藉全民國防意識的支撐。因此，對於國防教育極為投注，在建國之初，以色列有意排斥阿拉伯裔公民服役，但後來改變了此一作法，允許阿拉伯裔公民加入軍隊，其出發點即是盼望藉由軍隊中的愛國教育，將和

解、寬容和諒解的情懷，這是以色列獨有的國防教育形式。

2. 重視動員以彌補人口之不足：以色列全國劃分為北、中、南三個軍區，每區設一個前線指揮部，負責該地區部隊的動員、訓練和行政管理，以及戰時的指揮。戰爭動員令由國防部透過廣播、電視、電報、電話和口頭等方式下達。以色列預備役人員中還有很少一部分是已超過服現役年齡的而未服過現役的公民。該等人在服預備役之前，要到現役部隊訓練中心接受最基本的軍事訓練。

### （三）美國

1. 全民國防教育：擁有世界上最強大軍事力量的美國，非常重視國防教育，1958年，美國頒行「國防教育法」。根據「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 NDEA）的規定，從聯邦政府到各州政府，都將國防教育作為一項重要的公務活動。美國政府認為，國防建設可以帶動科技和教育的發展，科技和教育的發展又是國防建設的強大後盾。

2. 推行大國防觀念：美國政府推行大國防觀念，其出發點是突破國門界限，將本國利益及民族安全放在同盟、地區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軍事大背景之下籌劃。美國政府將大國防觀的樹立作為國防教育的重要內容，幫助國民認清世界發展大趨勢，認清國家在大趨勢中的地位與作用，認清政府根據大趨勢所採取的戰略對策。

## 參、我國推動全民國防背景與現況

### 一、我國推動全民國防之背景

#### （一）面對中共軍事威脅

近年來，由於兩岸在整體國力上差異懸殊，依2011年度日本防衛報告書，中共自1988年至2011年國防預算每年均以維持2位數百分比成長，居亞洲第一（如圖1所示）；中共國防預算逐年增加，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為5,878億美元，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G2）。中共不段提高軍費支出，中共的軍事力量已具有發揮無遠弗屆的能力，在2011年出現臺海軍力不平衡並向中共傾斜的現象。

#### （二）因應中共對台威脅之國防政策

單就軍事方面而言，面對中共對我軍事威脅，應有效整合政治、經濟、社會與心理等不同型式的防衛手段，有效降低中共對我之軍事威脅。全民國防對我具有重大的戰略意涵，也是國家生存戰略中，「以小搏大」、「全民禦敵」的具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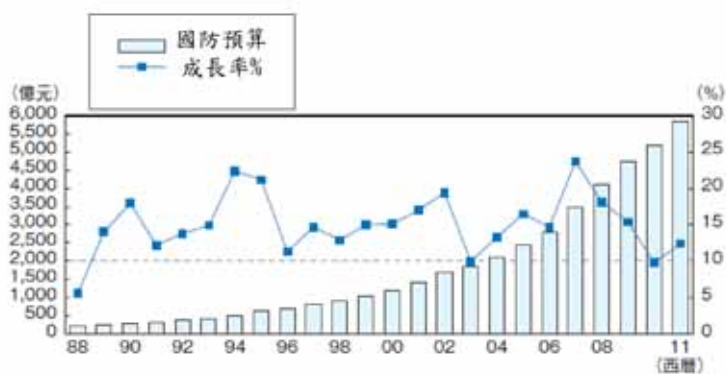


圖1 中共1988年至2011年國防預算統計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報告白皮書》，2011年頁79。

實踐，亦是全體國民必須具備的基本概念與常識。因應此思維，將有關國防事務公開，1992年國防報告白皮書，前國防部長陳履安在「序言」表示：「促使國民全力支持國防、瞭解國防產生共識」；另於報告書第五篇「建立全民國防意識」，其欲達成之目的主要在於「政策勸服」或「政策推介」，使全體國民能順服或接受於政府的國防政策，具有濃厚的宣傳或呼籲性質。

## 二、我國推動全民國防之現況

### （一）國防法之立法與現況

國防法法源引據中華民國憲法第137條國防之目的及組織：「中華民國之國防，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國防之組織，以法律定之」。其目的在制定包括國防目的及全民國防法內涵，在全民國防理念下，推動全民國防事務。1994年國防報告白皮書，明確率定每兩年發行乙次國防報告告白皮書，促使國民全力支持國防。依據假想敵對我威脅程度、國防政策、國家資源、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及政治、經濟、軍事與心理所制定之全民國防法，包含了國民教育、民防體系、動員制度及軍力狀況等。2000年立法院通過了國防法，第三條全民國防「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及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同年國防部將「九三軍人節」訂定「全民國防教育日」。這不僅凸顯出全民國防的時代意義，更能增進全民防衛意志，為全民國防的精神動員立下新的里程碑。國防法第三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及國

防有關之政治、經濟、心理、教育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

### （二）全民國防與政策學之關係

從政策學的角度來解讀全民國防之概念，用以涵括達成國防目的之範圍與列舉可予採用之政策工具，包括了傳統的軍事武力、動員防衛及與國防相關的各種措施，並刻意強調對國民參與國防事務的期待。因此，國防法的通過，可視為我國以法律正式要求全體國民於承平時參與國防事務的起點。

### （三）小結

根據上述說法，可知我國在國防理念與實際作法上係屬「綜合性安全」的概念，其目的乃在透過對全國民力與物力的妥善動員，以政治建設為基礎，以經濟建設為後盾，以心理建設為動力，以軍事建設為核心，以科技研發為先導，有效整合全民有形與無形資源，增進國防戰力確保國家安全，而非單獨透過軍事手段予以達成。

## 三、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及全民國防教育法之立法與現況

2001年11月14日公布「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落實全民國防理念，實施動員準備，保障人民權益。2005年2月2日制定「全民國防教育法」，並於2006年2月1日實施，透過全民國防教育，增進全民國防知識，在心理上認同國防，在使行動上支持國防，健全國家發展，確保國家安全。

## 肆、我國國防體制與全民國防之關係



表1 國防法頒布前全民國防政策

年度	全民國防政策現況
1992年	現代國防為全民國防，需要獲得全體國民的支持，才能發揮整體力量，達到保障國家安全的目的。
1994年	每兩年發行乙次，使國民對國防事務益加關心，確保國家安全最後憑藉，需賴全民共同支持、積極參與乃克有濟。
1996年	發展全民國防，激勵全民精神意志，落實國防與民生合一，平時廣儲戰力於民間，戰時迅速動員統合民間力量，確保國家安全。
1998年	運用全民力量，發揮民間自救功能，共同防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組織作為，是國防安全的基礎、軍事力量的後盾、社會安祥所必須。
2000年	現代化國防為全民國防，包括含以軍事、政治、經濟、心理及科技等相關事務。

資料來源：《1992至2000年國防報告書》

## 一、我國國防政策如何產生

國防政策以安全戰略為主體，包含政治、經濟、軍事及心理綜合運用，但仍以軍事戰略為核心，如巴特雷特（Henry Bartlett）模式，在此模式中列舉安全環境與資源限制為影響國防政策之主因，然而國家面對許多不同的威脅，但在資源有限狀況下，有所謂先後順序，設定往往會影響國防政策，如果判斷錯誤，將因為資源錯用，必然導致危險產生。例如，美國911事件發生前國防政策主要目標「是以向盟邦及友邦保證美國決心堅定不移，並有能力實現安全承諾…」。

911事件的發生，說明這些目標（包含以往或新設定）都不能回應當前安全需求，必須加以修正「強化反恐活動，確保國土安全」。因應政策調整，美國投入更多資源，增加國防預算480億美元，增幅15%，是20年來最大一次。

## 二、全民國防政策發展主軸

### （一）開創期全民國防政策（1949年至1989年）

1. 全民國防的戰略方針：

全民國防政策以「攻勢作戰時期」（1949-1969年），在軍事上提出了確保臺澎金馬，伺機反攻大陸的戰略方針。「反攻大陸時期」（1969-1979年），首先戰略思想由「以攻」為主轉向「以防」為主。其次，戰略立足點由依美「協防」轉向「獨立防禦」。「守勢防衛時期」（1979年至1990年），1979年1月中美建交，「中美共

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被廢止，1991年國防政策中的戰略構想提出了「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軍事戰略。

2. 開創期全民國防概念：國家政治情勢動盪不安，我國早於1933年6月17日公布施行兵役法，採取全國徵兵的法，繼而「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舉國全面投入抗日戰爭以救亡圖存。抗戰勝利不久，中共即行叛亂，因戡亂戰爭失利以致政府遷臺，兩岸對峙迄今，此期間所處的都是總體戰的戰爭形態，全民國防遂成必然的政策選擇。1960年7月1日學生軍訓工作由救國團移歸教育部主管，全面推行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訓練。1987年7月16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此時期國防教育仍隱末於軍事教育。

### （二）發展期全民國防政策（1990年至1992年）

1. 推動軍事事務革新：以推動軍事事務革新為國防政策發展重心，最重要包括軍隊國家化、軍隊軍政一元化、文人領軍、部隊職能有效分工、

表2 國防法頒布後全民國防政策

年度	全民國防政策現況
2002年	多元感性方式，結合學界與傳媒力量，舉辦學術研討會，擴大宣揚生命共同體、全民國防理念，強化國民憂患意識，認同支持國防。
2004年	為堅定國家信念與憂患意識，建立「國家安全人人有關，國防建設人人有責」的認知，以凝聚全生命共同體共識，政府結合社會、學校、軍隊與大眾傳媒，宣揚國防理念，期使全民關注國防、支持國防及參與國防。
2006年	以軍民一體、文武合一的形式，不分前後方、平時戰時，將有形武力、民間可用資源與精神意志合而為一的總體國防力量。亦即，全民國防係以國防武力為中心，以全民防衛為實體，以國防建設為基礎。
2008年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範疇已由傳統軍事安全，擴及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等綜合性安全趨向。為使全體國民能夠理解國防安全內涵，具備「國防安全人人有關，國防建設人人有責」的認知，形成「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的全民國防共識。
2009年	依全民國防理念，「納動員於施政、寓戰備於經建」指導，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整合相關部會及各級政府，共同推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結合全民國防教育法運用各級學校、社會團體、政府機關等體系，全面宣教並貫徹「傾聽人民聲音」政策，凝聚全民國防共信共識，積極建構「全方位」、「全民參與」、「總體防衛」、「民眾信賴」的全民防衛動員體系，具體實踐全民國防。
2011年	國軍為落實「全方位、全民參與、總體防衛、民眾信賴」的全民國防理念，近年戮力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以增進民眾國防安全認知，強化自我防衛意識為目標，有效爭取全民共同支持並參與國防建設；另依「納動員於施政、寓戰備於經建」指導，整合相關部會、各級政府，協力推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充分運用國家整體資源，厚植平、戰時動員能量，以健全國防發展，確保國家安全。

資料來源：《2002至2011年國防報告書》

國防體制扁平化、國防文官以及配合政府組織再造等工作，催生國防二法。1992年國防報告書說明現代國防問題實非軍事層次所能完全涵蓋，僅國家戰略主要部分，國防部與參謀本部亦不是國防組織全部，包含其他上層決策層次，故訂立國防組織法，主要以軍事事務革新為主並採行精兵政策。

2. 推行全民國防：因應全球化發展趨勢下，國家安全威脅不僅限於軍事方面，如恐怖攻擊、地震或海嘯，都可能造成重大傷亡。故國家安全須採取安全觀念，推行全民國防即全體人民，運用集體意志和行動，展現在面對外來威脅的一種國防機制。隨著國軍軍事事務革新，全民國防亦成為未來國軍發展主軸之一。

### （三）成熟期全民國防政策(1992年至2008年)

1. 推動全募兵制度：因應軍事事務革新，高科技武器裝備不斷日新月異，需要高素質人才及長役期人力，才能滿足運用高科技武器之需求；另受到少子化之影響，役男不足無法滿足兵員需求，2002年國防報告書兵役制度朝向以募兵為主的「徵募兵制度」併行，「全募兵制度」逐漸成為社會主流民意。

2. 強化全民國防效能：近年來國防事務已趨向公開透民化，間接促成國民對國防事務的關心和瞭解，例如軍方在民間學校進修，民方在軍事學校進修，國防事務也委託民間機構進行研究。基礎補保維修作業部份裝備，也委託民間機構或漢翔公司負責。軍事科技朝向軍民雙向共同發展，

同研發新式裝備，對國防事務精進具有正面意義。

#### （四）蛻變期全民國防政策（2009年迄今）

1. 續推動國防轉型：國軍以創新與不對稱的思維進行國防改革與轉型工作，積極籌購及換裝各類型現代化武器裝備，提升聯合作戰能力。此外，國軍已完成「精粹案」兵力結構調整方案及募兵制的規劃，後續將以更務實的態度精益求精，強化建軍備戰成果，持續國防轉型，有效提升國防組織效益，確保國軍戰力。

2. 精進後備部隊訓練：募兵制實施後，役男由入營服役1年轉為接受4個月軍事訓練，動員人力來源將不虞匱乏，規劃結合後備部隊專長，區分「入伍訓練」及「專長訓練」二階段施訓，結訓後成為合格戰鬥員，納入後備部隊及輔助軍事勤務隊編組，並持續輔以教育召集訓練，以恢復其戰鬥技能。

### 三、全民國防執行架構

全民國防為我國國防的基本理念，「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機制是實踐全民國防理念的具體作為。「全民防衛動員準備」的主要在納動員於施政，寓戰備於經建」的原則，結合政府各項施政計劃，推動動員準備事項。簡言之，基於全民國防理念，因應防衛固守、有效嚇阻之戰略方針需求，集中全國民力、物力，建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全民防衛動員區分平時準備與戰時實施兩個階段，平時要結合政府施政，俾以完成人力、物力及戰力綜合準備，達到積儲平時總體戰力，並支援地區緊急狀況應變事宜，在戰時則統合民間力量，支援軍事作戰，同時維持公務機關

緊急應變和國民基本生活需求。民防泛指所有非軍事行動，我國為有效落實全民動員防衛準備法與民防體系，成立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會報，由國防部兼任會報秘書工作，負責協調科技、衛生、交通、財力物資經濟、人力、精神共同推動全民動員防衛動員準備事項。

## 伍、全民國防反思與建議

### 一、全民國防之反思

#### （一）缺乏憂患意識

隨著兩岸關係和緩與交流頻繁，中共並從未放棄對臺動武。國人警覺持續降低，部分國人會心存僥倖期待國際的奧援，並相信中共絕不可能武力犯台，更認為從事國防建設，是一種浪費投資；另在學校學生對全民國防抱持應付心態，也是造成施行狀況不夠確切的原因。

#### （二）國防知性之旅

營區開放活動幾乎是社會大眾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其中，對於全民國防教育的推廣有更直接的助益。大批陸客湧入基地開放活動時有所聞，若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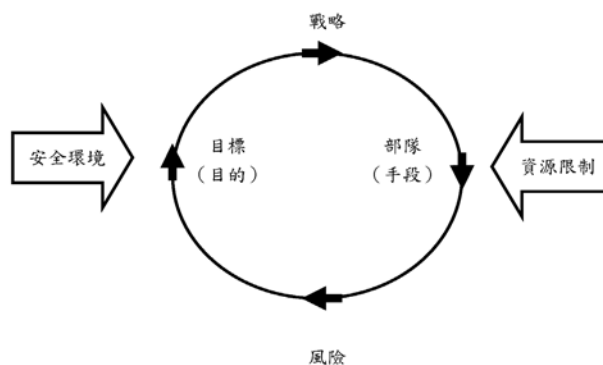


圖2 巴特雷特模式

資料來源：羅慶生，《國防政策與國防報告書》，（楊智出版社），2005年，頁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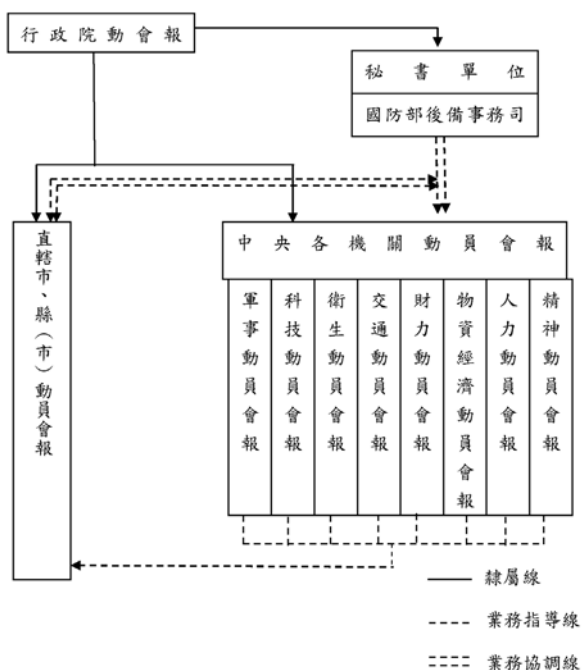


圖4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會報體系

資料來源：《2002年國防報告書》，頁256。

取驗證逐一進入營區，則必遭民怨，雖然陸客進入營區雖不致有洩密問題，但確會有觀感問題。

### （三）縮短授課時間

當全民國防向下延伸至國民中（小）學，高中（職）均以提高升學率作為招生宣傳數據，授課時間不增反減，從原本10學分，調整「國防通識課程」4學分，2010年再調整為「全民國防教育」2學分，國防教育面臨轉型。授課時數不斷精簡，課程內容必定隨之縮減。學校面對家長望子（女）成龍心態，升學主義為導向，想要落實全民國防，確有其難度。

## 二、全民國防之建議

### （一）深化全民國防理念

政府近年來，大力提倡全民國防，其主目的是

希望能夠提昇全民的憂患意識，整合軍民總體力量與資源，強化國防建設，增強國防實力。

1. 在教育體系方面：透過學校、社會、社區、與政府機關、網路實施，使之全民國防教育，向下紮根，強化有形及無形心防力量，建立正確防衛觀。

2. 在民防體系方面：動員民間人力、物力，予以適當之編組與運用，面對天然災害威脅能適時協助搶救。戰時更能以支援軍事勤務，達成保鄉衛土為目的。

3. 在後備軍人體系：以各縣（市）後備軍人輔導中心，平時強化服務工作及在營官兵急難救助慰問，戰時可協助動員整備、搶救災難等工作，以達「紮根平時，收效戰時」的效果。

### （二）建立全民國防諮詢系統

政府機關應建立有關全民國防的宣導訊息，如2009年88水災重創國家建設和農業能量，國軍發揮全方位的動員能量和，快速協助災民重建其犧牲奉獻與目共睹，將救災資料呈現於網路，透過無遠弗屆的網，可以讓國人更清楚瞭解全民國防的精神與意義；另於營區開放時，加強管制區域及範圍，避免陸客刺探軍情或從中破壞，藉以提升國人對國防正確的認知。

### （三）持續修訂法令及條文


我國「國防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民防法」等目前均已完成立法，2010年「國防通識課程」再調整為「全民國防教育」僅2學分，與立法後推動全民國防意旨相違，除應設法扭轉外，並鼓勵開設選修課程或利用週（班）會安排國課程討論，以強化全民國防教育。

## 陸、結論

全民國防在觀念上，是全民認識國防，展現高度的抗敵意志與決心；在定位上，是全民支持國防，就是總體國力的累積、運用與對決，也是國家生存戰略中，「以小博大」、「全民禦敵」的具體實踐；在作法上，是全民參與國防，必須從立法、國家長遠發展與敵情威脅層面，做通盤周延的考量與擘劃；在體制架構上，必須以「心防」奠定根基，以「軍事作戰」為核心，以「民防」達成倍力的效果，以「全民動員」作為防衛作戰成敗的關鍵，四者缺一不可，並以良好的制度運作與周延的立法規範，發揮總體國力相乘相加的效果。

全民國防是世界各國國防發展之主軸，也是檢測國家面臨內憂外患時，是否經得起災害與戰爭之考驗。因此，現代化國家均將全民國防納入重要國防政策。若國防缺乏全民之支持，國防事務必然無法持續進步，缺乏全民認同和支持之國防，國防力量絕對無法厚植生根。例如，位處中亞的以色列為例，在歷次的中東戰爭期間，遂能在極短時間內擊敗數量龐大的敵人，使以色列能夠轉危為安。從以色列全民國防案例來看，以色列藉由全民防衛意識的支撐，加上全國民眾對全民國防的深切認知，間接維護了以國生命與財產之安全，值得我全體國民學習與效法。

全民國防不等於「兵民合一」或「全民皆兵」的國防武力，而是將國防事務的參與層面擴及全體國人，同時能有效結合軍事與非軍事資源，不分平時或戰時、不分前方或後方，產生有形與無形戰力。在面對戰爭型態的轉變，國家面臨各種

傳統的軍事安全，擴及非傳統的安全威脅，尤以中共迄今未曾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國人更需建立全民國防的理念，從國防知識普及、群體共識建立、精神戰力動員做起。具備「國防安全人人有關，國防建設人人有責」的認知，形成「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的全民國防共識。 

### 1 政府出版

- 1.《81年國防報告書》（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月。
- 2.《83年國防報告書》（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3月。
- 3.《85年國防報告書》（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5月。
- 4.《87年國防報告書》（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
- 5.《89年國防報告書》（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北部印製廠）2000年8月。
- 6.《91年國防報告書》（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北部印製廠）2002年8月。
- 7.《93年國防報告書》（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北部印製廠）2004年12月。
- 8.《95年國防報告書》（國防部）2006年8月。
- 9.《97年國防報告書》（國防部）2008年5月。
- 10.《98年國防報告書》（國防部）2009年10月。
- 11.《100年國防報告書》（國防部）2011年7月。
- 12.《日本防衛報告書》（日本國防部），2011年。

### 一般書籍

- 1.曾章瑞，《全民國防概論》（國立空中大學）2006年6月。
- 2.謝元熙，《文武合一教育之功能》（台灣書店），1993年。
- 3.羅慶生，《國防政策與國防報告書》，（楊智出版社），2002年8月1日。
- 4.羅慶生，《國防政策與國防報告書》，（楊智出版社），2005年2月1日。
- 5.顏國樑，《教育政策執行與應用》（師大書苑），1997年。

### 期刊學術論文

- 1.邱伯浩，〈從國際現勢 全民國防教育〉，《幼獅軍訓電子報》，2006年7月1期。
- 2.陳子平，〈全民國防的法制建構與實踐〉《國防雜誌》，第21卷第4期，2006年4月。
- 3.孫國祥，〈全先進國家「全民國防教育」成功案例之比較-以瑞士、以色列與美國為例〉《國防大學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
- 4.張永真，〈全民國防教育政策執行之研究-執行人員觀點〉《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2月。
- 5.楊建安譯，《亞太安全譯文彙輯II》《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12月。
- 6.戴政龍，〈全民國防與國防治理：公民參與的觀點〉《國立嘉義大學通識學報》，2009年12月。

### 網站資料

- 1.教育部<http://www.edu.tw/>
- 2.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mainpage.shtml>

# Re-examining the U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著者／張競

海軍軍官學校72年班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1998年班，英國赫爾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海軍中權軍艦艦長  
目前為中華民國榮譽國民，並任教於國防大學政治研究所與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The “Six Assurances” is an extremely unique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diplomacy. It literally creates a viable international norm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urther, given the origin of such unilateral political statement and its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it also establishes an alternative format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since it never has the formal codification, signing, ratification and depositary process generally adopted for pledging the legitimacy and legality.

Authors of this paper intend to re-exam the nature of the Six Assurance from the angle of realpolitik because of its fundamental pragmatism. Various versions taken by different parties that satisfying their individual political preference is also a point to be noted in the paper so that to certify its utilizations. Nevertheless, examples and arguments will be suggested to verify the validity of statements noted in the Six Assurances. Issues regarding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will be discussed since the starting point of such assurances are driven by a US-PRC communiqué regarding the US arms transactions to Taiwan.

Moreover, whether the US would have the legitimate position to have such assurances will also be reviewed so that to assess the genuine functions of such political statements. Perspectives of various US administrations towards the Six Assurances are another dimension worth of review. The stances defined by the US Congress after it had aware of such political statements and their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may possibly reflect the potential of the Six Assurances in the future.

Authors of this paper have a genuine conviction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is not only the valuable political asset for both the U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a value human wisdom ever addres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and political practitioners in the sphere of diplomacy. To some extends, it also benefits Beijing as it may still have certain reluctances to corner Taipei into some track that the communist regime would never wish to happen simply because it may actually terminate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Facing some political commentators in Washington advocate to review the Six Assurances, authors of this paper had a good reason to exam it again so that suitably arguing why such a practice is still a cornerstone supporting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Even such a political promise may not so perfect in its original design, yet, it does act as many parties involved originally expected. By the standards or criteria generally adopted i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t is never a perfect design. But its perfection has been validated by the executions in the past years. Authors of this paper are most willing to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udiciary arrangements and realpolitik.



###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Six Assurances***

The Six Assurances was originated b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s negotiating the third US-PRC diplomatic communiqué regarding the arms sale to Taiwa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an extremely unique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diplomacy. It has literally created a viable international norm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ix Assurances is not perfect in its original design, yet, it does act as many parties involved originally expected. By the standards or criteria generally adopted i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t is far from a flawless design. But its perfection has been validated by the executions in the past years.

Notwithstanding the Six Assurances was promised by the Reagan government and some wordings within the original text has somehow become irrelevant to the reality, the political promises have been followed by subsequent US administrations with variation in the degree of emphasize between each administration. Although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was the request from Beijing to terminate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the Six Assurances can, to some extent, also serve Beij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authority

may still have certain degree of reluctances to corner Taipei, thereby forcing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simply due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original goal of the Six Assurances since, unlik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no written preamble to the Six Assurances had ever existed to specify the purpose of these political terms. It was a set of political statements unilaterally given by the US government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leadership on Taiwan shortly prior to signing the US-PRC joint communiqué regarding the premises of terminating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The initial text of the Six Assurances was verbally delivered on July 14, 1982, to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by James Lilley and a message attached to these statements may more or less reflect the goal of the Six Assurances. The message is known as "I want to point out ..... this decision on a joint communiqué is based on a PRC decision only to use peaceful means to resolve the Taiwan issue. On this point, the U.S. will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e PRC says, but also will use all methods to achieve

surveillance of PRC military production and military deployment. The intelligence attained would be brought to your attention. If there is any change with regard to their commitment to peaceful s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the U.S. commitments would become invalidated”, which at least reflects the origin of the Six Assurances and the reason for signing the coming US-PRC communiqué on US arms sale to Taiwan.

Whether certain messages delivered by James Lilley on July 26 and August 16, 1982, to President Chiang can be also be viewed as the goal of the Six Assurances is a matter of judgment. According to Ambassador Harvey Feldman, messages of reassurance from President Reagan together with the Six Assurances such as “U.S. side has no intention of setting a date for termination of arms sales. The U.S. does not agree to the PRC’s demand to have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m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predicated on one thing: that is, that the PRC will continue to advocate only to use peaceful means to settle the Taiwan issue”, “The U.S. will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e PRC says, but also will use all methods to achieve surveillance of PRC military production and military deployment”, “The intelligence attained would be brought to your attention”, “If the PRC agrees to the U.S. suggestion and issues the joint communiqué, the U.S. would continu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sell such military items as Taiwan really needs”, “any change

in circumstances will of course change our judgment of Taiwan’s defense needs” and “Our only interest in this matter is that any resolution of these issues be accomplished peacefully. We will do nothing to jeopardize the ability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deal with this matter in their own way” had been delivered to Taipei during three James Lilley’s visits to President Chiang. Nonetheless, all these messages could only implicitly express the goal of the Six Assurances. However, according to James Lilley, the Six Assurances was simply a sign to Taiwan that it was not being abandoned b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Theoretically,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is unilaterally initi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ere was no legitimate space left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add their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shape the final result of these statements. Otherwise,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would have prepared terms much favorable to its political preferences, should it own the privilege to put its wo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dministration’s mouth at that time. Nevertheless, Taiwan undeniably had the concession of a prior notice for the coming US-PRC joint communiqué as well as a certain degree of consultation on the contents of the Six Assurances before the final settlement of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It indicated that mutual trust did exist between Taipei and Washington during that period of the US-ROC diplomatic history. Yet, the influence of Taipei could not compete with the pragmatic

interests that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in Washington needed from Beijing at the time. Otherwise, Taipei would simply pay its greatest effort to stop another US-PRC communiqué that would fundamentally damage its security interests.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it took James Lilley three visits to settle the whole issue,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certain reconciliations were needed then. We may believe that certain inputs from Taipei to shape the final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should not be totally groundless.

Ambassador Harvey Feldman categorized the format of the Six Assurances as non-paper employed by the US Foreign Service for American diplomacy. As defined in his article, ‘As used in American diplomacy, a “non-paper” is a document on plain bond paper, without seal or signature, intended to convey a position or policy in an informal but nevertheless authoritative manner’. Despite this, we may still believe that the nature of the Six Assurances is undeniably official. Nonetheless, the Six Assurances had never ever gone through any formal codification, signing, ratification and depositary process generally adopted for pledging the legitimacy and legality in charg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 therefore should not expect the Six Assurances would have the same capacity like th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has not been as solid as international treaties, yet, these statements unquestionably reflect US policies toward

Taiwan from the beginning. Further, these statements are addressed as the US policies by various actors who own the authority to say so. For example, immediately after the 1982 August 17 US-PRC Communiqué on arms sales was settled, at a hearing on August 18, 1982, titled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hosted by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 Hous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contents of the Six Assurances, “did not agree to set a date certain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no mediation role for the U.S.”, “nor will we attempt to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 “no change in our long-standing position on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he Chinese at one point suggested 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be revised. We have no plans to seek any such revisions” and “should not be read to imply that we have agreed to engage in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Beijing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are addressed in the prior prepared statement offered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ohn H. Holdridge though some phrases were not completely identical.

Holdridge’s statement at this hearing was later adopted b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Stanley Roth on May 15, 1998, to reassure the validness of the Six Assurances as the U.S. policy by a written statement noting the administration upholding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articulated by then-Assistant Secretary Holdridge in his 1982 testimony



to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to questions posed at a hearing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n May 14, 1998. Moreover, on March 8, 2001, at a hearing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n U.S. Foreign Polic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Powell explicitly noted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remained U.S. policy to Senator Jesse Helms and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ould never favor consulting the PRC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Kelly has assured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ould continue to follow the Six Assurances as the policy so that excluding the possibility of U.S. mediation and putting pressure on Taiwan to go to the bargaining table as attending the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in March 2002.

Also, it is believed that President Bush himself did not respond to the linkage of reducing missile deployment targeted at Taiwan to a restraint of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proposed by PRC President Jiang Zemin at the U.S.-PRC summit in Crawford on October 25, 2002, was based on policy consideration including the Six Assurances. The Six Assurances is also accepted by researchers to be an essential element like the three communiqué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guiding the US policies on Taiwan. In spite of such a perception, the Six Assurances is not listed in the Key U.S. Foreign Policy Documents for the Region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bu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ree US-PRC communiqués are indisputably included.

Interestingly, the Six Assurances is sometimes believed existing in a form of formal document that directing the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Yet, there was no formal codified version ever published by any agency of the US administration as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were initially stated. Actually, the Six Assurances was delivered by James Lilley in his capacity as the Director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in the form of a blind memo with no letterhead or signature to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through Fredrick Chien, the Vice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et, readers of this study should be aware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is on the other hand perceived as a relevant part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uphel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netheless, it is worthy of note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can be emphasized as US policy but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may also urge certain political maneuvers which fundamentally contradicts the context of the Six Assurances. For instance, at the hearing title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Next 25 Years” hosted by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 2004,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Kelly then reiterated the Six Assurances as the US policy whilst actively advocating Taipei and Beijing to dialogu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ithout preconditions”.

From the answer of a question taken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at November 10, 2004 Daily Press Briefing, the Six Assurances had been indisputably again affirmed by the statement, “There is no change in U.S. policy, including regarding the Six Assurance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és, and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is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Six Assurances had been interpreted as prai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President Chen’s initiative of cross-strait peace proposals delivered in a national security meeting in Taipei. Nonetheless, the Six Assurances is addressed to be the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once more.

The next surge of addressing the Six Assurances happened in 2007 as the mutual trust between Taipei and Washington dramatically deteriorated by President Chen’s political maneuvers at that time. It was reported that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on June 14, 2007, to reaffirm the Six Assurances at an opportune time while meeting with Raymond Burghardt, the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President Chen believed that it was essential to preven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downgrading Taiwan’s sovereign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was reported that Raymond Burghardt did not directly respond to President Chen’s request then. Likewise, there is no response to President Chen’s request from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administration at all.

The ROC Representative to Washington Joseph Wu later paid certain efforts to retrieve the original copy of the Six Assurances from President Reagan’s archive as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variants of the so-called Six Assurances. According to Wu, the record of the Six Assurances is restricted as state top secre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no one would have the access to the real content of the document. Nonetheless, Joseph Wu also claimed that he failed to access the file left i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o he could not acquire the true text of the Six Assurances.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eclined to respond to President Chen’s request of restating the Six Assurances, it more or less proved that these political propositions are essentially the privilege exclusively ow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dition political interactions around Taipei, Beijing and Washington. Allowing others to acquire political leverage from addressing the Six Assurances would be fundamentally unimaginable.

President Chen’s pledge of restating the Six Assurances had initiated the interest of review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after so many years. As argued by Randall Schriver, a former U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even if Taiwanese leaders got their wish, would they in fact be convinced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so-called assurances

are appropriate for their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s”, certain assurances contained within the Reagan’s Six Assurances can only reflect to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in 1982. A set of “six new assurances” is proposed by Randall Schriver in the same article, but no response from the US administration by any means but his perspective has been positively responded by Ambassador Harvey Feldman with written statement.

It is quite interesting to mention that Randall Schriver himself had never reviewed the validness of the Six Assurances during his service for the US government and charging affairs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Further, on June 16, 2011, within the testimony provide 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apacity of President & CEO, th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Randall Schriver still questioned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honors this elem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to express his concern of “not to give prior consultation to China on potential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in his written statement though he had ever criticize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Six Assurances before and never mentioned any word with this regard in his version of “six new assurances”.

The Six Assurances was mentioned again in early 2011 after the second joint statement issued by President Obama and Hu Jintao. Three communiqué and Taiwan Relations Act are separately noted by Secretary Clinton and President Obama. Nevertheless, President

Ma, Ying-jeou agreed that U.S. policy has been consistent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s and the Six Assurances during Raymond Burghardt visit in Taipei for discussing the joint statement with President Ma on January 25. It was reported that Burghardt reaffirmed the Six Assurances in his press conference afte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Ma.

Another wave for discussing the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emerged at the two hearings titled “Why Taiwan Matters” hosted by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separately held on June 16 and October 4, 2011. It is such a surprise to read the record of the first part of these two hearing sessions that certain experts could misunderstand the Six Assuranc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o inaccurately whilst criticizing Secretary Powell’s statement. It is recorded that Ms. June Teufel Dreyer,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University of Miami and Senior Fellow at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ever said, “In 2003,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published a handbook entitled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If I had a cell phone, I would be typing OMG. After that, Colin Powell, as Secretary of State, said, ‘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It is not a sovereign state.’ Violation of six assurances in Taiwan Relations Act—well, he misspoke”. Whether or not did Secretary Powell’s statement violate the Six Assurances o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 a matter of personal judgment, yet, no Six Assurances was ever noted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 certain. Nevertheless, Ms. Dreyer's real stance still can be clearly verified by her written statement attached in the record. In her written statement, a non-existed linkage between the Six Assuranc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d not been again created.

It also need to noted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was addressed by congresswomen Ileana Ros-Lehtinen,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in her opening statement at the first part of the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on June 16, 2011. Meanwhile, Randall Schriver, in the capacity of President & CEO, th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orally expressed his perspective on the Six Assurances, "we have six assurances that we still allege to honor", in this hearing session hosted by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ogether with a written statement already mentioned abov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was held on October 4, 2011. The Six Assurances was reaffirmed several times by Kurt Campbell,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No prior consultation with Beijing on US arms sale to Taiwan was also addressed repeatedly.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Dr. Kurt Campbell did not specifically reply to a request by congresswoman Karan Bass by stating "I knew you had said several times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were a part of U.S. policy. As a new member, I was just asking if you could reiterate what the Six Assurances

are". It was initially answered by Kurt Campbell as "They are primarily associated with no prior consultations about arms sales" but immediately confessed with "And there are some other variants of those and I would be more than pleased to make sure that in a private consultation come up and provide you greater clarity on those issues". It had actually touched a spot of controversy on the real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since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were not formally codified initially.

###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Six Assurance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ix Assurances. Each of them may reflect pers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r political preference or even aspiration of future political destiny.

According to the "ROC Statement on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released on August 17, 1982, the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offered by President Reagan to Taiwan on July 14, 1982 are:

In negotiating the third Joint Communiqué with the PRC, the United States:

1. has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2. has not agreed to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RC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3. will not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4. has not agreed to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5. has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6. will not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the PRC.

Another version is noted by Ambassador Harvey Feldman in various articles. It stat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1. Had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2. Had not agreed to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arding arms sal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3. Would not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4. Would not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5. Had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6. Would not exert pressure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cording to Feldman,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initially expressed to President Chiang on July 14, 1982, by James Lilley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1. Had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2. Had not agreed to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RC regarding arms sal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3. Would not play a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4. Would not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5. Had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and

6. Would not exert pressure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

This version is indeed similar to other versions from all possible official channels except several wordings used here.

There is another version claimed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ohn H. Holdridge propos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sted as below. Nevertheless, this version has been strongly defied by Harvey Feldman in his article "Taiwan, Arms Sales and the Reagan Assurances" and is never consistent with the version publicized by Taipei on August 17, 1982. Even the testimony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delivered by Holdridge himself at the hearing on August 18, 1982, titled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hosted by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 different from the text shown as following:

1.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et a date for termination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2.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alter the term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3.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engage in advance consultations with Beijing before deciding on U.S. weapons transfers to Taiwan.
4.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erve as a mediator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5.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alter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f Taiwan (that is,

while we would continue to regard Taiwan as part of China, the question of reunification would be left to the Chinese themselves, with our only stipulation being that reunification be by peaceful means.) Nor would we exert any pressure on Taiwan to engage in negotiations with the mainland.

6.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formally recognize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Based on Holdridge's statement, the website of Taiwan Document Project listed a vers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as below,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July 1982

In 1982, during negotiations for the Third United States - China Joint Communiqué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the Taiwan government presente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six points that it proposed the United States use as guidelines in conducting United States - Taiwan relations. According to former Ambassador John Holdridge,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o these points, conveyed this assent to Taiwan, and, in late July 1982, informed the Congress of the agreement. The six points are:

1.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et a date for termination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2.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alter the term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3.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consult with China in advance before making decisions about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4.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mediat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5.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alter its position abou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which was, that the question was one to be decided peacefully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and would not pressure Taiwan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6.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formally recognize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his version is accepted by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and publicized on their official website. Likewise, it is noted by Kerry Dumbaugh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n his report. This version was also adopted by Ms. Dreyer in her prepared written statement to the hearing titled "Why Taiwan Matters" hosted by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held on June 16, 2011.

To be honest, it is impossible to reach any consensus on the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as many versions are actually followed by communities with various political preferences. Different versions already turn to be basis for political accusations. Any effort to reach reconciliation on the text of the Six Assurances will be most likely inconclusive since there was no codified version at the very first beginning.

Nevertheless, on September 14, 2011, Chairwoman of the U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Ileana Ros-Lehtinen introduced H.R. 2918, the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1, it contains a vers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noted as below,

SEC. 106. CONTINUATION OF THE



## SIX ASSURANCES AS GUIDELINES IN CONDUCTING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Notwithstanding any communiqués entered into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assent to the six assurances provided to Taiwan in July, 1982, includ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

1. has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2. has not agreed to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3. will not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4. has not agreed to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5. has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and
6. will not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text of the Six Assurances formally codified by a branch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t may provide much authoritative clarification of the text noted for the Six Assurances, regardless whether this bill may eventually pass or not. The process of codificat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has been already completed by an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th no immediate objection from any agency charging the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uthors of this study would

further argue whether the text of the 1982 Six Assurances may still be meaningful according to the text shown in the draft of the bill.

### *Text Analysis of the Six Assurances*

To conduct a text analysis on the Six Assurances, it may inevitably notice that there are mainly two forms for the beginnings of each assurance, “has not” and “will not”. Most likely, items start with “has not” should reflect to the immediate political event, i.e. the coming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on arms sale to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substantial wordings of these four assurances,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and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are two items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the arms sale but the other two statements,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are only in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rms sale to Taiwan. Nevertheless, these four statements are seemingly reflecting the US stances at the moment right before signing the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on arms sale to Taiwan. These four assurances were very unlikely designed to address long term US positions according to the phrases they have adop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other two statements,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and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well present long-lasting US policies on Taiwan and China. Regardless of the implication of the phrases chosen at the

moment, all these six statemen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US persistent stances toward Taiwan eventual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choosing such wordings turned to be insignificant in any way.

If we scrutinize each assurances noted in the Six Assurances by realities accordingly, we may apprehend that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are not still so consequential since the dynam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d already reshaped the conditions for establishing these political propositions. First, the promise of excluding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was tight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tent noted in the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If the US-PRC Communiqué signed on August 17, 1982 had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certain premises of terminating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then how can we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nfirm that the situation becomes mature and all conditions requested have fully been satisfied already? Setting a date before the realities can be totally satisfactory is literally reversing the causality relationship. It therefore needs no worry on whether any date will be selected to stop arms sale to Taiwan befor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can be completely settled.

The second assurance about never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is also a matter in no way needs to worry about.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to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a consultation of the arms sale to Taiwan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First, any items included by the arms sale may naturally contain military significance. In another words, all these articles may be lethal thus causing damages or even fatalities to soldie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hould any armed conflict really happen in the future. If that is the case, who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may have the authority and dare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to allow these products becoming assets own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med forces that potentially producing deadly effects to their military personnel? The political stake is simply unbearable. Given the political calculations mentioned here, all the answers for the consultation of any item existed in the arms sale shopping list for Taiwan should be “no”. If no other responses may possibly be issued by Beijing, then it is virtually meaningless to engage in any prior consultation. In essence, it is totally logically irrational to imagine such kind of consultation. Although a briefing to the PRC officials on arms sale to Taiwan after the decision already made is a sensible and understandable diplomatic gesture, yet, it should never be confused with the prior consultations.

Second, adding the PRC’s perspectives to the US arms sal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can only increase the overall complexity of the process. The arms sale itself is an inter-agency task that requiring extensive reconciliations and consensus-buildings within the US

administration. No segment in the whole task force managing arms sale may have the privilege to override perspective of other agencies. It simply reminds us that all cases of arms sale need to go through scrutinization of each individual agency involved for the decision to pass unanimously. Hence, no agency in the arms sale process would impart its privilege to a foreign state and risk damaging its professionalism and reputation by foreign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y arms sale containing foreign intervention will certainly undermine its fundamental function of supporting US security interests. It is extremely unlikely to blend any external factor into such national security formula. If the closest US allies do not have a say in associated arms sale processes to their neighboring nations, how can a potential strategic competitor possibly gain such a privilege? Can the leadership in Washington afford the political damages caused by potential accusations of surrendering such an exclusive right to foreign states?

Third, allowing PRC's involvement in the arms sale to Taiwan is essentially opening the Pandora's Box. There are many sets of countries containing tensions may easily lead to armed conflicts but maintaining arms sa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 United States holds a prior consult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rms sale to Taiwan, then how can Washington decline the same request from Israel regarding arms sale to surrounding Arabic states? Likewise, Greece,

Turkey, India and Pakistan may also deliver similar requests to the United States. Given the potential of such terrible consequences, a prior consultation with Beijing on arms sale to Taiwan is an untouchable red line that one should never ever attempt to cross. Beijing may request Washington to comply simply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fundamentally intends to negate every military item to Taiwan through arms sale channel. Hence, this request is in essence a pseudo-proposition which should only deserves a straightforward answer - no.

Regarding the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t was unquestionably a correspondence to Beijing's request prior to the discussion for the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This was signified by Holdridge's testimony, "the Chinese at one point suggested 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be revised. We have no plans to seek any such revisions", right after signing the communiqué in 1982.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ally followed this assurance is a matter of perception and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If we insist that the term "revise" means a comprehensive overhaul, then such an act has never taken place so far. However, if we adopt a more flexible definition of "revise" to include amendments made by other legislation bills passed by the US Congress, as well as certain US President Executive Orders of which had substantially altered the practices noted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s, then this assurance has not been perfectly follow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all the alternations regardi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re apolitical in nature.

It is clearly no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de 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s been amended through various schemes including follow-on acts and US President Executive Orders. Particularly, the President Executive Order 13014 of August 15, 1996 titled Maintaining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n Taiwan signed by President Clinton has purposely and substantially altered certain practice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cts changed the practice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re specifically titled as “Amending laws” by the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Popular Name Table. It is worthy of note that all these amendments or alternations have never changed the main theme regarding the political aims establish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n 1979. Many amendments were made to influenc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lso, it is necessary to address that none of these amendments or alternations had been achieved prior to the declarat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It therefore was reasonable to grant an assura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agreed to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n 1982. Hence, this may indirectly demonstrate to the readers that the four assurances started with the phrase “has not” was made to clarify the situation up to the point prior to signing the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rather than a permanent guarantee as many people would rather choose to believe.

The statemen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an even more interesting political statement.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has not been any legitimate US proclamation that defines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Many propositions are expressed by different actors and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to address US stances over Taiwan. Even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frequently reaffirmed but the comprehensive context of the policy is still more or less untold. Further research to cover various perspectives and arguments is required to address the US position on Taiwan’s sovereignty. Nevertheless, the fundamental issue remains that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owns any legitimacy to decide Taiwan’s political destiny.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have any legitimate right to decide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then Washington will need to bear the obligation to explicitly express its stances over the matter. Possessing the influences is attributed to the sphere of realpolitik but ownership of the legitimacy is in the field of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Given the power ow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stance to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Taiwan is of undeniable importance. Yet,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gaged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several decades as it substantially exercises the possession over the territory of Taiwan, no diplomatic objection had ever formally delivered to the ROC government in Taipei, it is difficult to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any legitimate right on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did uphold its own stances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three Baltic States as they were occupied by the Soviet Union but Washington did not have any legitimate position to intervene the matter. There are many similar cases still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decline to accept many political realities. But disagreements on these political actualities do not justify the right for intervention. Neither the surviv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r the political destiny of Taiwan can merely rely on this assurance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legitimate right to decide upon the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In terms of realpolitik over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influence is unquestionable. But the legitimacy is the factor that really matters. Anyway, this political statement is the core element that made leadership in Taipei and officials in Washington repeatedly addressing the Six Assurances over the years without really considering its true implications.

The last two assurances started with “will not” can be reviewed together. The two statements,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and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oth have seemingly lost their significances in light of the intensive cross-strait exchanges and negotiations at the moment. Started from September 12, 1990, since the first cross-strait agreement titled Kinmen Accord regarding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was signed, over forty formal negotiations had taken place and thirty-eight cross-strait agreements or equivalents were established.

As we consider the categories covered by the cross-strait negotiations and the established agreements, it is very hard to imagine that there is any space lef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unless the two sides approach into political negotiations in the future. Reluctances of political negotiations from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 significant. As of now, conditions for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s have not yet matured. Even though, there is hardly any expect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y be needed to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any more. On the same token,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re are so many exchanges and negotia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ce. The likelihood of occurre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ese two assurances is extremely insignificant.

In summary, we have reviewed all the significances actually owned by each political terms contained by the Six Assurances for the moment. But the value of each assurance varies with time since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is fundamentally dynamic. Whether any of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may become surprisingly important at certain occasion, the possibility can not be totally excluded.

### ***Conclus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x Assurance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US, more precisely,

President Reagan personally, to grant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was to alleviate the concerns from Taipei as Washington negotiated the arms transaction to Taiwan with Beijing. To grasp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x Assurances, scrutin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nature and its subsequent implications of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is therefore needed.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he US arms sale is never to satisfy the defens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curers but to serve the US security interests. It is obvious that all these arms transactions signifying a political support to the regimes acquiring defense items, hardware or services, from the US since it represents these specific nations' existence in the US security formula. In substance, the arms transactions may enhance the receiving states' defense capabi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symbolic contents may also boost the morale of these nations to keep their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ies parallel with the US security interests. It therefore needs to note here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does not guarantee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will automatically proceed with no objection from the US administration. As admitted by Admiral Keating in a seminar hosted b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n July 16, 2008, the arms sale to Taipei could be frozen by the US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stabilization of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despite the risks of being criticized of violati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Six Assurances.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e case of

Taiwan since Washington is the solely persistent arms provider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over the past six decades despite the interference from vario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s well as security calculations over such period. Nevertheless,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has been magnified by various administrations in Taiwan, particularly after 1979, as the political indicator of the US support to Taiwan. This highlights the rationale behind Taipei's sensitivity regarding any potential US-PRC interaction regarding arms sale to Taiwan. On the same token, it justifies why a set of US assurances driven by the political bargai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on arms transactions to Taiwan would be essential to the leadership in Taipei.

Another implications brought by the arms sale linkage is the potential for enhancing jointness between the procurers and the suppliers. In another word, interoperability can be established along with the arms transactions since the process containing hardware, services and, in many cases, doctrines. Whether different armed forces can fight together and to defend common enemies shoulder to shoulder must rely on mutual understandings. To know features and thinking of your friendly forces is basis of establishing unity of effort and avoiding fratricide. The military exchanges may follow with the military procurements.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are vital elements in arms sale projects.

Technical supports, logistics consulta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establishment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arms sale. The possibility of expanding the sphere of military diplomacy to achieve high level officer visits, port calling, strategic dialogues and eventually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from simple military procurement relationship always exist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arms sale can be so essential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pei and Washington.

What should be the right way to manage the Six Assurances for Taipei and Washington? Authors of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neither side should ever try to revise the Six Assurances, including any act that may seemingly enhance them, otherwise, such a political maneuver will inevitably deliver unnecessary political signal that may complicate the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particularly,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If we never ask our partner to repeat the wedding oath from time to time as reaffirmation of their love, then similarly there should be no reason for Taipei to ask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tate the Six Assurances. Sometimes, a lack of restatem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imply an invalidity of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 it may simply imply an inconvenienc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either due to timing or political atmosphere, to do so. Forcing one's spouse to restate their wedding oath against their free will may ultimately lead to the failure of the marriage.

Taipei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the US arms sale is never a relationship made to last forever. The origin of this relationship is in essence

circumstantial, especially, after Washington signed the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in 1982. This stance was clearly addressed by the testimony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Kelly at a hearing in April 2004. It was told as Beijing meets the promise of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and subsequently adjusting its military posture accordingly, then in Kelly's own statement, "it follows logically that Taiwan's defense requirements will change".

So Taiwan should never try to use the Six Assurances to clamp the US freedom of action and force Washington to restate them. It is most essential to keep Taipei's policies paralle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interests. All military leadership in democratic states knows in order to have the change to get the sword they want, they will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political masters can get the vote. Likewise, if Taipei would like to get the sword, they should support Washington to reach its objectives in the aspect of security. Is it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implicat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Authors here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expectation, no matter how illusive it may really be, is the basis of conviction, and subsequently, commitment. Therefore, leaving the Six Assurances as it was actually may cause no harm, conversely any excessive action to challenge these cornerstones supporting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is totally unnecessary and may be dangerous. Perfection of political statements is achieved by execution, never its original text. 🙄

## Reference

- Central News Agency. "President Urges Us to Reaffirm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 June 16, 2007.
- Dumbaugh, Kerry. "China-U.S.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877, July 23, 2008.
- Feldman, Harvey.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2-3: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2, 2007.
- . "Reagan's Commitment to Taiwan;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Taiwan Communique." The Washington Times, April 23, 2001.
- . "Taiwan, Arms Sales and the Reagan Assurances." American Asian Review 19, no. 3 (Fall 2001): 75-101.
- "H.R. 2918: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1."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ptember 14, 2011.
-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Prepared Statement of John H. Holdridg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edited by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U.S. House, August 18, 1982.
- Hearing on U.S.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rch 8, 2001.
-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estimony of Randall G. Schriver, Founding Partner, Armitage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 Ceo, th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ne 16, 2011.
-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Next 25 Years." edited by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ril 21, 2004.
- Kan, Shirley A.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0341, June 24, 2011.
- Kan, Shirley A.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0957, May 21, 2012.
- Kan, Shirley A., and Wayne M. Morrison. "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41952, August 4, 2011.
- Lilley, James, and Jeffrey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Lu, De-yun. "Bian Has Been Changing All the Time, Americans Will Not Be Taken in Any More." United Daily, June 16, 2007.
-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Record of Question - Daily Press Briefing on Taiwan -- Six Assurances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0, 2004.
- Presidential Documents 42963-42964. "Maintaining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n Taiwan." Monday, August 19, 1996.
- Schraver, Randall. "Randall Schraver on Taiwan: Taiwan Needs 'Six New Assurances'." Taipei Times, August 22, 2007, 8.
- Snyder, Charles. "Us Praises Chen Shui-Bian's Peace Plan." Taipei Times, November 12, 2004, 1.
- . "Wu Rues Us Secrecy Issue." Taipei Times Jul 07, 2007, 3.
- Taiwan Document Project.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assurances.htm>.
-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Key U.S. Foreign Policy Documents for the Region." <http://www.ait.org.tw/en/key-documents.html>.
-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ttp://www.fapa.org/generalinfo/sixassurances.htm>.
-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Chronology of Meetings."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82&CtUnit=2567&BaseDSID=21&mp=300>.
- . "Negotiated Agreements."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84&CtUnit=2569&BaseDSD=7&mp=300>.
- The View from Taiwan. "Nelson Report: More on Arms Freeze." <http://www.michaelturton.com/blog/page/2/>.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mending Laws, Taiwan Relations Act,,"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Popular Name Table, 2011 edition, 2011.
- . "Text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hapter 48-Taiwan Relations, Title 22-Foreign Relations and Intercourse." 2011.
- .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 June 16, 2011.
- . "Why Taiwan Matters, Part Ii,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ctober 4, 2011.
- Wortzel, Larry. "Why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affirm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 March 16, 2000.



- 1 \*Dr. Ching CHANG is the Research Fellow of the ROC Society for Strategy Studies; \*\*Dr. YuJane CHEN is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 2 The occasion of delivering the Six Assurances has been specified by the "ROC Statement on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recited from Shirley A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0341, June 24, 2011), 39 and note 101.
- 3 Harvey Feldman, "Reagan's Commitment to Taiwan;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Taiwan Communiqué," *The Washington Times* April 23, 2001. (recited from the archive of the newsmag.com website, accessed: 2012/06/15, <http://archive.newsmag.com/archives/articles/2001/4/24/221517.shtml>).
- 4 Harvey Feldman,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2, 2007), 2-3.
- 5 James Lilley and Jeffrey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note 101.)
- 6 Harvey Feldman, "Taiwan, Arms Sales and the Reagan Assurances," *American Asian Review* 19, no. 3 (Fall 2001). (accessed: 2012/06/12, <http://ehis.ebscohost.com/ehost/detail?sid=d82c6d4b-9355-41c4-982d-c93815917fed%40sessionmgr12&vid=1&hid=6&bdata=JnNpdGU9ZWwhvc3QtbGl2ZQ%3d%3d#db=aph&AN=5719658>). In Feldman's paper,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Holdridge's statements claimed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were initiated by Taipei has been strongly rebuked by Feldman.
- 7 Feldman,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2.
- 8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Prepared Statement of John H. Holdridg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ed.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U.S. House (August 18, 1982).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42-43 and note 111.)
- 9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42 and note 111.
- 10 Hearing on U.S. Foreign Policy, ed.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rch 8, 2001).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26 and note 73.
- 11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27.
- 12 *Ibid.*, 21-22.
- 13 Shirley A. Kan and Wayne M. Morrison, "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41952, August 4, 2011), summary page and 4.
- 14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Key U.S. Foreign Policy Documents for the Region," <http://www.ait.org.tw/en/key-documents.html>.
- 15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4.
- 16 Lilley and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 17 Shirley A. Kan,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0957, May 21, 2012), summary page.
- 18 Please see the texts excerpted from statement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Kelly at the hearing title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Next 25 Years," hosted by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 2004,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72-73.
- 19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Next 25 Years," ed.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ril 21, 2004).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27 and note 75.
- 20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Record of Question - Daily Press Briefing on Taiwan -- Six Assurances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0, 2004). (Record is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4/38081.htm>).
- 21 Charles Snyder, "US Praises Chen Shui-bian's Peace Plan," *Taipei Times* November 12, 2004, 1. (accessed: 2012/6/14,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04/11/12/2003210698>).
- 22 Central News Agency, "President Urges US to Reaffirm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 June 16, 2007). (accessed: 2012/6/2014, <http://www.roc-taiwan.org/UK/ct.asp?xItem=38543&ctNode=3244&mp=132&nowPage=2&pagesize=50>).
- 23 De-yun Lu, "Bian Has Been Changing All the Time, Americans Will Not Be Taken in Any More," *United Daily* June 16, 2007. (translated by AIT in a cable titled "Media Reaction: U.S.-Taiwan Relations", sent on June 18, 2007, revealed by Wikileaks, data accessed: 2012.6/11, <http://wikileaks.org/cable/2007/06/07AITTAIPEI1381.html#>).
- 24 Charles Snyder, "Wu Rues US Secrecy Issue," *Taipei Times* Jul 07, 2007, 3, (accessed: 2012.06/11,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07/07/2003368445>).
- 25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as proposed to reaffirm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to counter the impact possibly caused by a white paper regarding Taiwan policy relea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ough the actual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might not be necessarily opposite to the text of the PRC white paper. Please see Larry Wortzel, "Why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affirm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 March 16, 2000), (accessed: 2012/06/11,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00/03/reaffirm-the-six-assurances-to-taiwan>).
- 26 Randall Schriver, "Randall Schriver on Taiwan: Taiwan needs 'six new assurances'," *Taipei Times* August 22, 2007, 8, (accessed: 2012/6/11,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07/08/22/2003375330>).
- 27 Feldman,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4-5.
- 28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estimony of Randall G. Schriver, Founding Partner, Armitage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 CEO, th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ne 16, 2011), 3, (accessed: 2012/6/11, <http://foreignaffairs.house.gov/112/scho61611.pdf>).

- 29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81 and note 221.
- 30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 Serial No. 112-42 (June 16, 2011), 11-12.
- 31 Ibid., 13-17.
- 32 Ibid., 18.
- 33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hy Taiwan Matters, Part II,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Serial No. 112-70 (October 4, 2011), 10, 30, 37, 43; Kan,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59.
- 34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hy Taiwan Matters, Part II,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43.
- 35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39 and note 101. It was also pointed out in noted 101 by Shirley Kan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fifth assurance noted in Chien Fu's memoirs is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support the PRC'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However, comparing statement "no change in our long-standing position on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shown in the testimony given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ohn H. Holdridge at a hearing on August 18, 1982, titled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hosted by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 House and the "ROC Statement on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it is more likely an extending elaboration.
- 36 Feldman, "Taiwan, Arms Sales and the Reagan Assurances."
- 37 Feldman,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2.
- 38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Prepared Statement of John H. Holdridg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 39 Feldman, "Taiwan, Arms Sales and the Reagan Assurances."
- 40 Please note that there are still few differences in the vers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publicized by the Taiwan Document Project website and other Holdridge's versions. Please see Taiwan Document Project,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assurances.htm>.
- 41 Please see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ttp://www.fapa.org/generalinfo/sixassurances.htm>.
- 42 Kerry Dumbaugh, "Taiwan: Text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U.S. - China Communiqués, and the 'Six Assuranc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96-246, July 13, 1998).
- 43 Ms. June Teufel Dreyer: Prepared statement submitted for the hearing i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 16 and note 2. Please see the original text introduc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 44 on Foreign Affairs, [http://www.hcfa.house.gov/112/ROSLEH\\_065\\_xml.pdf](http://www.hcfa.house.gov/112/ROSLEH_065_xml.pdf); also see "H.R. 2918: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1," 112th Congress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ptember 14, 2011). (accessed: 2012/06/11,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2/hr2918/text>); also please see Bill Text, 112th Congress (2011-2012), H.R.2918.IH, H.R.2918,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1 (Introduced in House - IH), The Thomas system of the website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F?c112:1:./temp/~c112vtPQub:e14240>:
- 45 Notifying PRC officials about the arms sales to Taiwan is already a practice that confirmed by Secretary Panetta on October 23, 2011. Members of US Congress also subsequently agreed that the notification itself does not explicitly violate the Six Assurances but it should not develop into any prior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C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See Kan,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60.
- 46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Prepared Statement of John H. Holdridg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 47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Text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HAPTER 48-TAIWAN RELATIONS, TITLE 22-FOREIGN RELATIONS AND INTERCOURSE," United States Code, 2011 edition (2011), 1100-01, (accessed: 2012/06/12. <http://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11-title22/pdf/USCODE-2011-title22-chap48.pdf>).
- 48 Presidential Documents 42963-42964, "Maintaining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n Taiwan," The President Executive Order 13014 (Monday, August 19, 1996), (accessed: 2012/6/12,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6-08-19/pdf/96-13014.pdf>).
- 49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mending laws, Taiwan Relations Act,,"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Popular Name Table, 2011 edition, 2011), 1213.
- 50 For the record of formal cross-strait exchange and negotiations, please see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Chronology of Meetings,"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82&CtUnit=2567&BaseDSD=21&mp=300>. More complete record is available on the Chinese edition website of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06&CtUnit=2541&BaseDSD=21&mp=19>. For the cross-strait agreements already established, please see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Negotiated Agreements,"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84&CtUnit=2569&BaseDSD=7&mp=300>. Again, more complete record is available on the Chinese edition website of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3810&CtUnit=2083&BaseDSD=7&mp=19>.
- 51 Please see the website of The View from Taiwan, "Nelson Report: More on Aarms Freeze," <http://www.michaelturton.com/blog/page/2/>; Kerry Dumbaugh, "China-U.S.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877, July 23, 2008), 1, 15; Kan,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48.
- 52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Next 25 Years," April 21, 2004, recited from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op. cit., p.29 and note 151

# 軍校國際化之希望工程

## 談第二外語法語的推行

著者／孫毓德  
Dr. Adele Y. D. Sun

法國Limoges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  
曾任海軍官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現任海軍官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組教師

近年來軍方意識到武官人才嚴重不足，開始正視國際化基礎建設的重要。如何訓練種子軍官具備作為世界公民的三大要項：增加語言能力、國際常識與文化認知上的培訓，讓下一代成為有競爭力的地球村公民，尤其國際軍官的恢宏氣度。因此，國軍第二外語學習的推行，正符合2011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報告中“學會學習”的新世紀公民精神。各軍官校自2011積極推行第二外語，兼顧各軍種優質武官的人才儲用外，突破英美主流國際化學習的侷限性，拓展國軍多元文化認知與禁忌應對。培育更優質的外交人才鞏固邦誼與國際關係，更是刻不容緩。

本研究特別針對法語教學策略之初探，藉官校法語教學方法之改進，提供軍校生充分的機會深入此軍售國的文化多樣性。鑒於在集體生活紀律下需更有效率的第二外語學法，尤其靈活應用在自學時段，因此推展一種為三軍官校量身訂做的互動“同步輸入-輸出法語”教學法，藉助全方位認知(說讀聽寫)的教學策略，結合當今世界性語言訓練標準與目標「歐盟語言能力指標」(CEF)並行，鼓勵種子軍官突破其學習外語的傳統模式與方法錯誤的困境。按部就班累積外語溝通的質量，順利推行全語能力教學成效，拓展全軍的國際公民視野，為人生打開多扇學習之樂的視窗，共臻二十一世紀世界公民的教育目標：終身學習，全人發展。

### 壹、前言

每一種外語的學習，都為我們敞開一扇心靈的窗。歐洲是西方文明的母地，隨處可見藝術美學在生活，而生活本身即是藝術美學。其文化實則靠累積、維護以傳承，一如其他更悠久的文明如中國文化，自然有別於速食、淺根文化的堆砌，或僅只於浮面的裝飾。歐洲是西方文明之搖籃—

所有西方人的原鄉，從高中學習拉丁文、聖經故事、人文思想、共同傳說軼事、祖籍血統等。

法國人文的美感與精緻，武器科技工藝的先進精良，人權的捍衛與促進，造就其多元平衡的國際形象及對世界之貢獻。法蘭西民族深以其文化自負，甚至自傲，自有其傲世人之國際地位。自重自強，計畫性均衡發展，傳統與科技並進，

生產力最高，具獨立人道個性的國家（不支持好戰/邪惡政權）；熱愛秩序和理性 一個和平與包容的國度。法蘭西民族注重個人的原創性，生活品質，樂於從事他們想做的事。法國文化富有多元性，十三世紀以來法國都是世界文化中心之一。自然和人文景觀豐富多樣，法國是世界第一旅遊大國，一年7,000萬遊客。法國本土面積為台灣十五倍強，人口約為台灣三倍多；一半務農，六分之一人口住在巴黎地區。法國是歐洲最大的農業生產和出口國。在農業及農產品加工服務方面（主要是糧食和農業食品）占世界第二位。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世界經濟強國第4位。在許多方面擁有優勢，如交通運輸、通訊、農業食品加工、製藥、銀行、社會保險、旅遊以及傳統奢侈品（輕革皮件加工、成衣、香水、葡萄酒等）。在接受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法國占世界第四位。

法語，如此精緻又豐富語言的風行，是在政治、經濟穩定成長，文化與科技之和諧發展中，政府與民間一致維護與捍衛的豐美果實。自近代外交制度源起於中古世紀之歐洲以來，法文即在近代外交史上占龍頭地位。當時，各城邦國林立的歐洲，為解決彼此的爭端，須派專使議和，以求各國均勢並達維持和平之外交共識。於是，法語在近代外交的文書語言使用上一枝獨秀。法語，是繼十五到十八世紀間的拉丁文，成為近代外交文書的使用文字。直到聯合國成立初期，仍風華獨具。而法語，因用字精確無疑義之虞的美譽，成為國際正式場合與交換公牘的必要使用語言。今日，無論是國際大型活動如條約、協議、合同、國際協定 國際條約，甚至是各類國際運動競賽。法文文法嚴謹，用字確切，不致生原文

本義上之誤解，因此在國際約文上占重要外交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都遭佔領的法國，是能深刻實踐珍視古蹟與文物的智慧。除了全民一致進行抵抗運動，維護基本國格外，仍竭力珍惜文化歷史。因為勝利製造的虛榮的幻影，常與文物頹圯劃上等號。不爭的殘酷事實是，戰火確是文物重建與復興的殺手，許多先人珍貴無價的建築，伴隨戰爭灰飛湮滅。類似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各種文藝建設的終結者。因為歐陸國家盡知，摧毀了古蹟建築，就是銷毀了具體的歷史記錄，也就失去了最活生生的歷史教材與前人存在的明證。因此，對多數珍視藝術與歷史的歐洲人而言，戰爭是“浩劫”與“荒謬”的同義詞，即使是最負面的歷史遺蹟，皆具正面啟迪之教育功能<sup>1</sup>。只有當我們足跡踏在一塊珍惜自身文化的土地上時，對生命與歷史感觸與自省，是深刻而永恆的。留學歐洲，對喜愛觀察及思索的人而言，是一番精神的淬煉。

## 貳、法國的人文成就對世界之貢獻

法國向為歐洲知識、情感與地理的中心，閃耀著文化歷久的光芒。其文化保存、科研水準、先進技術、貨幣穩定以及生產成本的控制等在全球都有高度評價。身為西洋文學與文化觀察教師，更希望能藉由西方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介紹西方自十五世紀末以降之人文主義。如何潛移默化地落實在近代日常生活，處處表現出人道的關懷，其中可茲取法者，諸如捍衛人權[成為立法議題]、包容多元文化、禮儀應對、社會福利、守時守法觀念、文化與傳統手工的傳承、藝術鑑賞、



建築時尚美學、人性化公共建設、人道的醫療政策、注重科學與精確性、崇拜女性及其騎士精神等，在在提昇了個人生活品質與存在的尊嚴。厚植西方基本知識與藝術涵養，可充實個人生活品質與溝通深度。<sup>2</sup>

法蘭西民族深以其國語自負，甚至自傲，相信很多朋友曾有訪法而“英語無用武之地”之慨嘆。深究其因，知法語純粹化演變之不易與該民族團結維護之努力。從歷史中了解了這個自重、自恃，盡力保護文化遺產的民族之後，會油然而生敬畏效尤之心。自2002年六月起，法國舉國更積極參與國際化運動，其第一大報《世界報，Le Monde》，已定期於週末版中闢有英文New York Times之專欄，供全民共同學習英語。自從十六世紀前葉，確切時間為1539年，法國國王François I 宣布以法語為國家語言後，法語快速地躍升為國際通行語言，甚至成為躋身上流社會的高貴口音(haut ton)。當義大利語在十五與十六世紀擅場歐陸之際，就是以法國文學與思想為其傳播媒介，而法國儼然成為歐洲的知識中心。接而，法語在十七與十八世紀縱橫所有歐洲宮廷社會，成為歐洲德、英、西、俄等宮廷間優雅風尚的交際語言，期間經歷了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六的統治期間。十七世紀期間，法國王權鞏固政治穩定，古典藝術文明正處啟蒙復興時期，文化活動在新興的中產階級推波助瀾中，更加興盛繁榮。於是，在法國文學家、藝術家與政府通力努力下，法語又經多次純淨化與文學化之洗禮，尤其在文藝語言審查及精確語法詞典的編纂工作上，如十七世紀前半葉設立之法國翰林院。<sup>3</sup>使得其遠古複雜而多元的語源，成為統一而精確，合乎邏輯又

高雅的語言。到十七世紀後半葉，創造了法國文學黃金時代。繼之的三個世紀，締造了西方世界的法國風。到了十九世紀，法國成為歐洲知識界的中心，而這個民族就以其國語為榮為傲，自恃為舉世集精緻藝術、文學與浪漫氣質於一的榮耀民族。歐陸皇室競相以法語為溝通語言，富貴人家紛紛雇用法籍教師與祿姆，以學習法語及法式禮儀。許多歐陸文學家熟諳法語，並能以法文創作，如德皇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 1740-1786, 1712-1786 in power)諳法語甚於母語，而英作家Oscar Wilde (1854-1900)，義大利作家Casanova de Seingalt (1725-1798)，十九世紀末美國作家Kate Chopin (1850-1904)，Samuel Beckett (1906-1989)，中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1940-)等，適足以說明法文當時在西方無遠弗屆的魅力。其後德語漸漸通行，成為西方科學與哲學方面的強勢語言。英語則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佔世界語言之鰲頭。<sup>4</sup>

法國向來在國際有其特殊的民族性，酷愛閱讀<sup>5</sup>、獨立思考、文藝美學品味高、生化醫學、太空科技、軍武研發創新、鍾愛傳統文化、重視生活情趣與品質、善容忍(不喜改變)、擇善固執、重文化傳統保存、人道社會、尊重人性人權的立國精神。從伏爾德(Voltaire, 1694-1778)抨擊執政者；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批評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國立國的「人權宣言(DDHC)」(1789,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講求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et fraternité; freedom, equality and brotherhood)的精神、拿破崙法典

(1804, Code Civil des Français; The French Civil Code)；左拉(Zola, 1840-1902)聲援的「德雷福斯案」(Affaire Dreyfus, 1859)，該事件成為法國歷史上有名的反種族歧視事件，皆可見其尊重人權之一斑。又1999年11月法國實施「共同生活公約」(Pacs, Pacte civile de Solidarité)：不論性別，都可簽署共同生活公約，確定互助關係的共同生活。法國極重視其國際角色，一向在國際事務上奉行獨立、反對霸權(美國)的立場，期建立國際聯盟戮力追求和平。源自戴高樂以來的法蘭西民族獨立政策，勇於獨排眾議獨立思考，不受外力脅迫與影響，如曾支持西藏獨立；不輕易介入他國戰爭或衝突，2003年3月的美伊戰爭等，法、德皆不支持美。儘管因歷史等種種原因兩國應該保持友好關係，大部分法國人都對與美國接近持保留態度，排斥其速食文化與食品，如麥當勞無法在法生存。

法國首都巴黎，一個具有五千年的藝術與歷史、地理與歷史淵源之都。由於具此特殊之文化背景，因此其舊市中心為聯合國文教中心評為世界資產重鎮。塞納河(Seine)將其分隔，而知名的「河左岸」，是人文藝術與創作匯集的靈感之地，吸引不少世界級的藝術家、詩人或革命家的第二故鄉，如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2000)、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奈波(V. S. Naipaul, 1932-)、列寧(Лéнин, 1870-1924)、托洛斯基(Троцкий, 1870-1945)、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1891-1980)、李察萊特(Richard Wright, 1908-1960)、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 1929-)、葛珠·史坦(Gertrude Stein, 1874-

1946)、卡達雷(Ismail Kadaré, 1936-)、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 1904-1980)、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梵谷(Van Gogh, 1853-1890)、畢卡索(Picasso, 1881-1973)、曼雷(Man Ray, 1890-1976, 達達藝術家)、康定斯基(Кандински, 1866-1944, 頹廢藝術家)、蕭乾傳(1956-)、張義雄(1914-，首位得法國<藝術家年金>之台灣畫家)等人，都常沉浸在「左岸」的咖啡文化中。<sup>6</sup>免來自全球的觀光客在巴黎市受到「問道於盲」不友善的挫折，2005年巴黎市長於年初全法市長會議中承諾：“法國歡迎更多的中國人去旅遊，並將積極採取可行措施，為他們提供中文服務。”(«La France s'efforcera de créer un environnement de langue chinoise pour les touristes chinois.»)，上屆總統薩科齊(Nicolas Paul Stéphane Sarközy, 1955-)，於2010年曾要求所有法國學生至少應該掌握兩種語言，七歲就該開始學習英語或其他外語。其任內教育部長Luc Chatel (1964-) 曾表示：“在當今法國，不掌握英語將是一種阻礙。”薩科齊從小學英語，在會見外國領導人時無需英語翻譯。近年來在法國政府鼓勵下，法國年輕人學習外語(特別是英語)之意願有增高之趨勢。

## 參、國內第二外語之教學政策與成效

正因為如同其他應用語言，法文是活的語言(langue vivante)，不是希臘文或拉丁文多止於閱讀。一如所有外語溝通的方式，絕非僅只於一種視覺能力的認知，包括廣義的語言、文化與思想交流。外語教師有義務在課堂上活化且生活化這個語言，甚至是學習所有外語不變的原則，並均衡而充分的發展全語能力。不應以文法學習為

唯一法門或以之來挫折學生，不但有迫使他們逐步，到全面放棄外語學習，甚至影響其一生自我肯定與健全人格。教育者宜廣開多元學習法門 提供多元知識學習者多認識討論、勤閱讀，尤其引介一窺的語言與文化堂奧的機會，從學習中培養興趣與進一步的自信。因此，教育者有絕對義務設計使學生樂在學習的教學大綱並認真執行完畢。堅信唯有師生間先建立良好的互信溝通，循循善誘，促使學生認真學習發問，使教師欣然於知無不言，傾囊相授，彼此共享接觸新語言學習互動的喜悅。

法語是一種看字拼音的語言，一如其他使用羅馬字的西方語言。相對於英語，法語具有較固定而簡單的發音規則與邏輯，這是其發音特色的第一點。因此在熟悉了發音的規律性後，初學者可輕易唸出任何單字，即使他們並不了解字義。其次，法語發音上的特色還有喉音“r”。<sup>7</sup>三，法語單字的重音放在第一音節，一般字典音標中不會標示。無論該單字有多少音節，唸時字尾則輕輕帶過。有四個位在字尾的字母，即s, t, d 及z，慣例上不發音，除非適逢讀誦時的連音(la liaison, linking)。因此在一句中能聽到波浪似的“重輕-重輕輕-重輕輕輕…”或“重輕-重輕-重輕輕-重輕-重輕輕-重輕輕輕…”<sup>8</sup>，抑揚有致，加以滑音(la liaison)產生具歌曲音韻的吟唱效果，宛如綿綿細訴成為法語發音的特色之四。<sup>8</sup>讀句子時，它一般常存在於代名詞(主詞)與動詞間，動詞與名詞間，冠詞與名詞間及名詞與形容詞間，以及一些片語之中。<sup>9</sup>前一字的字尾是子音，而後接字首字母為a, e, i, o, u, 或不發音之h時，自然產生連(滑)音特色。學習者從掌握一個字，到熟悉一個句子

的語調，從模仿、習慣到完全適應法語的語調，都是要用心聆聽並學習，隨時保持好奇心與好學好問習慣。

教育部將持續加強辦理第二外語教育，除大學中設立的第二外語系所<sup>10</sup>，或國立大學外語中心(台大法語中心、台師大語言中心、政大語言中心、中山大學法語中心等)，先期在我國高中第二外語教育紮根，以培育更多優質的第二外語人才。回顧國內中、小學第二外語教育推行溯自1993年至今，近20年來歷程緩慢，高中部分至近2010成效逐漸顯著。儘管向來高中傳統的升學壓力，初探台灣法語教育之前景漸入佳境，10年來，高中生修習第二外語的人數大幅增加，通過語言檢測的學生數亦逐年攀升，對拓展青年學子視野、提升我國高中教育國際化及培育多樣性外語人才大有助益。如從90學年度的198校、3萬3千多人修讀，到99學年度的453校、8萬9千多人選修；而100學年度計有479校開設3,593班，共10萬8,166人次學生修讀第二外語課程，語種包含日語、法語、德語、西語、韓語、拉丁語、義大利語、俄語、越南語及印尼語，供有興趣之學生選讀，進行國際化廣度與深度交流。教育部為加速推動國內英檢測驗國際標準化，於94年6月28日(台社(一)字第0940075287C號令)通函各政府機構及學校單位改採全世界唯一國際通用之歐盟語言能力指標(CEFRL,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作為「台灣官方英語能力指標」。

聯合國憲章(Charter des Nations Unies, United Nations Charter)中約定有六種官方語—中、英、

法、俄、西及阿拉伯文，六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鑑於國內外語教育之主流誤導，從教育部到國科會人文處，養成國人偏狹的世界觀與國際觀：以英語=外語；外來者非英-美人士莫屬，或以英美代表全世界之諸般一切，殊不知有他。無異在高喊國際化口號中畫地自限，在英美近親文化中固步自封。誠如國內南部語言權威校院，文藻外語學校前校長李文瑞先生，曾客觀評論國內獨厚英語霸權文化，相對排擠了其他語言文化存在之生態，實不利台灣國際化之推廣，提出勿偏聽偏從的愷切警訊與質疑：我們的英語教學，係屬殖民化或國際化？「英語霸權正是促使世界語言迅速消失的元兇。多學一種語言，不僅增加一種溝通工具，更能豐富與開闊視野。但是瘋狂地以英語為唯一的外語，我們的世界將愈來愈狹窄，甚至與世界脫軌。」<sup>11</sup>鑒此，李前校長指出台灣的英語教-學具有下列六點迷思的矇蔽，值得全國從事廣義外語教師共同思考：1.英語能力即是競爭力？2.英語只是運用工具？3.本土化，或殖民性全球化？4.英語化是國際化，抑或英語霸？5.越早學習，效果越佳？6.英檢是評量唯一方法嗎？”一如學界具遠見前輩之通見，稍後陳光興教授之坦言亦呼應了李校長：

台灣當前的狀況，我個人過去長期任教的外國語文學系[清華大學]，外文幾乎全等於英文(或是更精準的說該是美語)，日語、法語基本上是點綴用... 德語的專任教師很少外文系有，更別說鄰近地區的韓文，以及東南亞的越南、泰國、印尼和馬來文了！整體而言台灣的外語教育是可想而知的貧乏。不僅如此，台灣外文系的定位似乎從來就不是溝通內外的橋樑，直到今天教師從來不

被鼓勵進行自己專長語言的翻譯工作，除了極為少數的個人... 以翻譯出版當代文學為志業。再加上學術體制近年來全面推動英文出版，壓縮多元語言文化的生存空間，使得台灣對內、外思想資源的開拓真是雪上加霜... 足以見得推動大學教育改革的學官們，對於轉變中的世界是全然缺乏認識，更談不上有足夠的胸襟提出具有前瞻性的願景了！<sup>12</sup>

目前國際上公認並執行一套全球語言學習教學評量架構，CEF，界定了所有的語言能力，是全面的語言溝通能力，為現有外語之教學提供一共通且共同的教學策略與訓練綱要。「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是由歐洲議會(Council of Europe)專為語言的課程設計、測驗、學習等所發展的一套架構，目的在促進歐盟的溝通、合作與團結。<sup>13</sup>洲理事會的規劃並未針對單一外國語言分級，將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能力指標納入，包含英語，分為六級：(A1(入門級), A2(基礎級), B1(進階級), B2(高階級), C1(流利級), C2(精通級))。CEF將語言能力，依照聽、說、讀、寫、互動等數個面向，由初級到高級界定為六級—A1、A2、B1、B2、C1、C2。語言能力指標的建立是一項耗時耗力的專業工作，以歐洲議會所採用的CEF來說，其發展是自70年代的英語能力門閥(English Threshold Level)開始，經過長達二十多年的研究，從許多語言學習理論的概念整合以及可行性的修正，最後呈現出今天的成果。以下簡介CEF及其所界定的能力指標：

### (一) CEF精神與基本內涵



目前國際上公認的三種重要英語能力指標為：(1)歐洲議會的「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CEF)；(2)美國外語教師協會編定的外語能力指標(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 ACTFL)；(3)加拿大語言能力指標(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 CLB)。<sup>14</sup>

(二) CEF所界定的能力指標(descriptors)，說明了語言學習者所能表現的語言行為(speech acts)。CEF在界定語言能力時，概括了語言使用者的一般能力(general competence)、語言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s)、語言活動(language activities)、以及語言使用的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s)。

## 肆、國軍放眼的國際交流格局：紮根法語教育

目前世界上有十五個法語區，分別是：法國、瑞士、比利時、盧森堡、西印度洋群島、剛果共和國、海地共和國、布吉那法索、馬利共和國、喀麥隆共和國、象牙海岸、塞內加爾、聖多美、普林西比、摩洛哥王國、摩納哥及加拿大魁北克區。此外，仍有法國昔日二殖民地，查德(le Tchad, 2006斷交)及越南(la Republique socialiste du Vietnam)。<sup>15</sup> 我國目前有二十三邦交國，其中有六國在亞太地區(l'Asie de l'Est et la Pacifique: Îles Salomon, Îles Marshall, Les Tuvalu, Les Palaos, Nauru et Les Kiribati)，十二國在中南美洲(l'Amérique latine)，四國在非洲(l'Afrique)，一國在歐洲(l'Europe, 即教廷國 le Saint-Siège

(Vatican))，其中三個為法語區(francophones)，海地共和國(la République d'Haïti)，布吉那法索(le Burkina Faso)及梵蒂岡(Vatican)。儘管國家外交活動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而受挫，但民間非政府組織(NGO)卻十分活絡，如農耕、慈善、教育、醫療、文化等國際交流的努力，使我國迄今享有128個旅遊免簽證國。

軍方人才培育政策，提供良性的進修與職場派任機會，有助拓展我軍官完備的國際外交軍種的外語學習環境，同時培養具多元文化認知素養的國際公民。無論是外環境的第一外語單項學習障礙，“軍方學英語唯一法門—通過ECL檢定”，或計畫個人職涯上的外語能力的加值，亦或要徹底從零開始接觸第二個可自主的外語學習，官校第二外語課程皆能滿足此學習需求。目前三官校皆常態開設有第二外語選修，如日語、法語、西語，海軍官校本開有德語課，於2011年新增韓語選修，共五種第二外語課程，而學習的級數與學習者本身的積極態度是相對應的。本校自1990年起即開設有日、西、法、俄等四種第二外語，期間皆有少數學生在自學中進階，其中以修習日語之人數最多，因國內歷史、地緣與媒體學習甚便利，進階班學習頻繁升級，輔導檢測之成效最出色。2000年因師資不足，實際僅日及法二種外語在傳播主流外多元文化。法語部分，2002及2003兩年曾奉國防部終身學習計畫開設過兩期海軍軍官公餘外語密集班課程(英語I-II、法語I [第一期]與法語I-II [第二期])，其中軍官的學習態度與成效均較官校學生佳，除因任職後更珍惜課堂學習機會，其次是已具較明確的學習目標。2010年本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通識選修課程中再增開

德、西二外語，2011年初同東南亞國協(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ince 1961)與時俱進，俾利知己知彼的學習並充實亞洲經濟競爭力，再增韓語(本軍曾有赴韓進修指揮參謀學院之名額)共五種，合計為通識歷史上開設最多第二外語課，即日、韓、法、西與德語。唯韓及德二外語師資難覓，中心仍努力公告招聘中。期官校戮力於及時滿足學子們的求知欲，進而拓展國際視野、增加國際競爭力，厚植我軍多元國際交流之能量。

2011年起奉國防部政策指導，敦促各軍儘早儲訓優質的第二外語多元人才，俾利派任無虞。我軍各司令部在前瞻拓展各軍外交實力，武官人才儲備問題上，需同時齊備“棍棒與紅蘿蔔”的配套措施，納實用主義於的推行的政策。以海軍官校為例，2011年在軍校(大專)積極推行第二外語教育，已較1990年教育部執行“高中第二外語選修”政策起跑慢了約十年。台灣中學、大學與語言中心中學習法語的學生超過15,000。法語居高中實用外語選修第二位。相形之下，對強調具科技與國際戰力的國軍，亦有人才短缺之滯礙。每年3月20日是全球法語日(Journée de la Francophonie)，全球法語區內說法語的人數約17,000萬人，我國雖與法語系大國(如法國、瑞士、比利時、加拿大等)並無實質邦交，惟武器(空、海等)之購置使用與科技工業文化之傳統，深信已拓展了許多國軍官兵的視野。<sup>16</sup>有鑑於各官校皆集專業、技職與軍事院校合一之特性，而軍官需具領導溝通實力與外交協商談判之任務。因此對外語之要求與訓練，更是刻不容緩。

因此，各軍校如何積極推動學校中的外語教

育，作為強化學生國際觀的基礎建設協助具強烈動機、潛力與興趣的學生，有機會在校園中習得第二外語？教師各校在第二外語教學上勢必建構出一種更積極有效、深入淺出與以受教者為主體量身訂做的教法的互動教學法——“同步輸入-輸出教學法”。此種全語(說讀聽寫)認知的學習，結合西方語言訓練進程與目標「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的外語教學指導原則並行，符合軍中“為用而訓”之需求來設計課程。就教師立場，該研究在個人先前教學中的具體作法與態度，是確定“教學過程即為一種輔導”；而學生則透過三階段來學習一適應探索階段、語文習得理解階段及逐漸獨立學習階段。在實行步驟上，則開設適合學習者的課程，並撰寫適合教學的教材分析研究。原則上，以本國教師適合擔任基礎入門課程的引導協助，免增其陌生感；餘如會話等最好有外籍老師指導，利學生儘早接觸建立全語的語境。目標語言之語境。其次，教師於第一堂課時，分發並回收一份法文選修課程的調查表，簡單地了解學習者個人外語學習梗概與期待，學習動機與預期目標。據此除可知學生學習需求之取向，利教師做為評量後課程設計方向的參考，並於期末時期勉學生達到其個別的目標，及師生間預期成效之差異。個人以法語科班文法教科書，搭配最新的法語會話影音教材，兼顧紮實的法語學習文法及全語應用素材，如適時地掌握即時法國文化生活脈動、閱讀網路教學資料、認識該國歷史、地理及日常生活介紹、提供檢測宣導、規畫參與校外法語教學活動等。

在教學執行上，檢討個別學生學期初所訂的學

習目標達成率，並設定培育外交官之格局，以利學用合一之成效。先談第一階段的正音練習要持續至少二學期來適應，利學生(員)熟稔之法語發音，期正確介紹並善用法語與即席的溝通交

流。其次，外語聯誼活動設計，除正課外應可擴充到社團，尤可善用分享的文藻外語學院法文系的畢業公演或園遊會，最好可聘任到非走本國教育部系統的法籍人士。又如2012年已加聘法文教師二員，或介紹位在國立中山大學校區內的台灣法國文化協會(高雄) Alliance française de Taïwan (Kaohsiung)，以激發學生自修的欲望及動機。最後，海軍官校通識中心曾於2009年榮獲國科會人文處補助，舉辦了軍校界首場學術研討會有關法國文化的《第一屆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一日安法國》，就外文語言與文化學習角度言已具前瞻視野，尤其對全海軍軍官這個又遠又近(在拉法葉艦中)既先進又典雅的國家，可以有進一步的藝術美學文化認識；對官校學生而言，可即藉此通識潛在的美學課程，平衡理工專業學生的人文素養，深化學生允文允武的氣質，鼓勵其從法文課程接觸拉法葉艦。當然希望有機會可邀請到曾駐法語地區之武官、外交官及法文名家或教授來訪。此外，教授亦須積極做教學研究，定期提出在教學課程與實際推行上的問題，並得及時做修正及改進。學習者宜隨時檢視分析自己的學習，自勉不退學習動機與態度，遵行正確的學習方法，充分利用僅有的零碎時間以學有所成，配合人才於國際化格局中悠然自在。而學生必須以嚴謹態度深入認識英文以外的外語，尤其是歐陸語言絕不若英語文法之單純易懂；同時亦前瞻到未來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東南亞亦是重要地區，印尼、越南

語將會是重要語言，所以培養學生有此能力，對未來的競爭力大有幫助。

目前學生在本校修習第二外語課程的條件有三。其一，是學習者修習一第二外語課程之順序，如法語(I) 法語(II)或法語(III)的次序來學習，以利其貫通精進並取得修課學分，在2011年也將所有第二外語課程的基本進階課程外，又統一增修了各第二外語進階訓練之機，會話(口說)、閱讀(讀)及寫作(寫)的訓練課程，後二項為學習輸出的成效，期著實提昇各語均衡的能力培養，為各軍所用。其次，在海軍官校有開課人數之限制，選修課未達十人以上(含)，在施行上，則會以登記修習學生的在校英文成績為優先參酌依據。外語教師除按照既定課程進度表外，也須注意上課的氛圍及情境營造，有助提高學習興趣與熱烈的課堂參與，並觀察學子在課堂學習態度與表現。當然優良的語言視聽教學設備與教材是首要條件，並於2011年獲司令部預算首度得充實中心的第二外語教材圖書，便利老師就近利用並介紹推薦學生，以利教學成效。因逐年皆向校方中正圖書館薦購基礎第二外語學習書籍後由其館藏，同時也兼顧了師生對其他外語初學自學基於教材，如俄、德、義、泰、越、印尼等語。作者定期改革教法內容，諮詢法語系所同業教師及法籍教師，交換教與學的心得，期望初學學生可漸漸登堂入室，增加學習興趣與信心，隨時與同儕及老師互動應用，增加學習成效。

依前述之CEFR教學策略執行後，則必有教學後評量之動作，即是“Reference for Languages：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構成一個良性的教-學精進的正循環。除校方與中心每學期間

卷外，教師定期依教學評量(assessment)作為個人隨後教學成效評估(evaluation)與改革之依據。主要是以考核來作評量全語教學的“同步輸入－輸出”教學法之成效。其中包括二次期中與期末測驗以及說、讀、聽、寫四次小考。同時，個人也以有效的教學(effective teaching)為課程設計的導向。亦即是例如了解他們對第二外語的認知及學習方法、動機、興趣，及他們在課後又是如何預習與複習？有無同儕可共勉學習？由於初學法文的第一年是著重在入門部分，因難在口語練習。所以課程設計重心在正音、發音反射練習及認識語法之特色，尤其同時注重後者基礎觀念的紮根。其次，由於法語選修上課時數每週僅二小時，於第一小時進行課文中文法講解，偏重理解與閱讀；至於第二堂課，則即時應用前一堂課的會話練習並做句型分析與造句練習。由於每一屆學生的學習資質與理解程度各異，致進度稍有不同，課程會依學習者反應程度而隨機微調或補充教學內容。以下為個人簡單第一及第二學期全語訓練標的：

在學習者部分，學生多是第一次接觸法文，必須按步就班，從頭認識學習，勤於接觸、覆誦加複習。任何學問都沒有捷徑。學習者要有接受國

際化洗禮的毅力與決心，為各種外派機會作好訓練與競爭前置，尤其擔任武官(attaché)時需應對接待全球各國代表，最基本能力與禮節是要掌握好各外語基本發音規則，才能完備基礎外交禮儀：準確唸對外國官員、代表及使節們的姓名。學習者學法語時則要自我要求勉勵，從零開始，確實準備學好正確發音，不宜夾帶英語音調發音，爾後才有可能講出具有辨識度的法語。畢竟西方人學法語可能帶有英-美腔或其特殊母語腔；但中國學生最好專心建立一套獨立的語言學習頻道，區隔開最先學習的英-美語夾，免引起受英語發音先入為主干擾的困惑。遑論就法語發音而言，中國人應更易輕易掌握，如法文字母中u之單音[ʊ]發音，國語中已具備；又 r(e) 之喉音在國語[ㄖㄝ]及(r [i]在閩南語[ㄖ一]中皆已具備，先天國人音準優勢已較英、美，特別是日、韓人士尤佳，學習時宜拋開英美語音標才能學好最首要也是關鍵一步。鼓勵軍官與種子軍官等學生能循序漸進地勤奮學習，不但勇於會話練習並善於表達自己，尤其要自我鞭策，因為一週二小時選修課程勉強入門卻無法有火候，才入寶山若空手回，不免可惜。如此預習與複習更形重要，全語學習宜善用作者所整理的附表資料。期能得到進一步進修的

## CEF自我評量表在海軍官校之運用

學期 訓練	Français I (French I)	Français II (French II)
全語 訓練	說：簡單問候與自我介紹 [唱：兒歌]	說：正式自我介紹(如參與遴選訪法活動)與對話(即時回答) [唱：法國國歌、流行歌教唱]
	讀：閱讀短文與小故事	讀：閱讀簡單時事及文章
	聽：理解對方提問/廣播	聽：聽寫練習/廣播/影片
	寫：法文打字、表格、卡片或 <auto-portrait> (書面自我介紹) 之撰寫	寫：便條、私人名片、信件與résumé之撰寫



機會，享受學以致用的實際成就感，甚至是即席對話新語言的喜悅。用心的同學要自勉，不退初心。學生在愉快的學習中也要有一顆認真積極的心，如備妥學習的工具書，課前預習，課堂多運用提問，舉一反三，積極時時跟唸出聲，不怕老師正音，課後複習及認真完成每課習作與家庭作業等，專注戒慎勿缺課，才能維持最基本的記憶與理解，克服學習新語的惶恐與特殊的心理障礙。

## 伍、結論

早在十七世紀法國名哲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6)曾說: «優秀的民族誕生優雅的國語，優雅的國語塑造優秀的國民。» 現代人識得古字古文，如英美人士可欣賞莎士比亞的古英文韻詩及劇作，尤其我們的國語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發展成熟，臻於完美，今人仍可輕易讀通四書、五經等古籍，連孩童亦能朗朗上口。更屬國際語言文明中唯一之典範奇蹟。<sup>17</sup> 有鑑於歐陸人在地緣與血緣自幼豐富、多元又共通的文化交流，身上流著多國祖先血統的歐洲人，也多以成年禮方式自助旅行過歐陸，每人至少熟悉三國語言。<sup>18</sup> 此外，1999年正式推行的“歐洲一家”觀念，更具體落實在經濟面的統一貨幣，歐元。我們該欣喜並榮耀於以中文為母語，一種西方人認為舉世最難學習的偉大語言，日、韓兩國知識分子必懂的“亞洲拉丁文”。比西方拉丁文更可貴的是五千年來，中文一直是活的語言，以其不斷地吸收並創新詞句，因此二十一世紀華人仍能通曉古文，甚而在生活中引用古經成語與故事。然而因天朝素來的鎖國外交傳統到海島的地緣封閉因素，國內學子較難體會到世界語言的流通性，甚

至會有“英文適足以認識世界”之迷思。故建議官校生在英語(第一外語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外，可再多增一種歐陸語做為放眼國際化的實踐，同時勉勵法語學習者能以嶄新的心態，迎接生命中的第二外語—學習法語。畢竟法語不同於英語，教師希望學生從零開始，虛心地紮下法文基礎，學習宜不帶任何學習英文的包袱或成見，亦勿再複製刻板無趣、非全語訓練的學習策略與方法，如馬修效應(Matthew Effect)的惡性循環。<sup>19</sup> 保持終身的好奇心與興趣的動力，大量地閱讀，勇敢開口去旅行、去觀察、去印證，在年輕歲月中預留多扇與專業及文化比較的視窗。

教育是人的建設。現代化教育建設的對象即是建人。此歐陸人本的終身教育理論，亦符合同臻二十一世紀世界公民的教育目標：終身學習，全人發展。三官校學子生個人興趣、服務理想與軍旅的精進目標相結合，增加專長學習的積極動機。先重視發展個人專業能力及興趣，配合多元濟濟人才的培育，為需才孔急的軍方所重用，符合國際化科技軍種之基本素養。教學策略改進足以影響學習方法，有利提昇學習者興趣。而語言要能不斷進步，師生需要滿足二個條件，一為學習者有恆的學習，二為密集地訓練學習者。但國防部可在臨門一腳的作法上，提供更多第二外語國(歐洲、南美及北美)交流機會給有潛力的多元外交人才，圓滿落實第二外語學習的教育政策。此皆有賴前瞻性的政策主導與人才培育，配合官校的逐年常態開設課程，尤其充實語言數位教室收視MOD語言頻道之便利性。兼顧菁英軍官外語進修的同時部分，亦須提昇整體官兵(大眾)國際化實質，俾利人才多元智能的擴充與日後擢用

無虞。例如，在三軍官校遴選赴美及赴日之艦訓或交流活動(to see the world)之訪問團學員，唯仍待常態性活動擴及其他第二外語(海軍官校2005年與陸軍官校2011年曾分別訪法交流；2009年有正期102年班同學一員首度赴拉丁美洲邦交國-宏都拉斯軍校就讀；陸軍官校2012年暑期訪宏都拉斯交流)，作為良性配套以蔚為學習風氣。

在推廣第二外語教學之學習誘因與動機上，上級宜有良好的配套與更積極宣傳，期多元人才皆俱。二十年來法語及其他第二外語教師前輩仍默默耕耘教育部與國防部國際化教育的希望工程，實有助國軍平衡理工科學生的思維與通識的國際宏觀與氣度，為軍為國培養加值之優秀國際人才，充實國軍中堅力量，全面提昇中華民國國際軍種之優質人文素養。👁️

- 1 中歐的奧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仍為帝政的奧匈帝國，不慎引發了世界大戰。自1938年起忍受德國納粹的佔領，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遭四盟國分割暫管，仍不反抗。從歷史角度來看，奧地利當政者的確免除了生靈遭荼炭，同時也維護了古蹟建築，不愧先人苦心孤詣的藝術成就。隨後在1955年成為永久中立國。
- 2 根據2009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法文: 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s, OCDE)在一項《社會一瞥, Aperçu social》調查結果，法國榮登“世界第一好命國”，睡時(每日近9小時，美、西次之)及餐時(每日130分鐘，紐、日次之)最高，工時又低(每週35小時為上限，即每日7小時，做足時間即走人)。這個浪漫國度應是“最懂生活情趣”之國，追求人生的圓滿，面面中庸均衡。沒有颱風、沒有地震，春天規劃夏天的度假，一年大概只上班九個月。法國的生育率在歐洲名列前茅，有工作的婦女產假四個月起跳，若預產期過了還沒生，產假跟著延長，遑論多胞胎最少八個月全薪產假了。反觀有點工作狂(每週超過53小時)的台灣，在集體拼經濟中似乎遺忘了經營好家庭，人生最重要的價值。
- 3 參謝鵬雄，〈法國的國語〉，N. 25442，中央日報（國際版），June 15, 1998。  
法語語源實來自印歐語系羅曼語的一支，經過長期語史之沿革，而能趨近代語言統一之成果。法文字母的始祖經腓尼基人選自加爾底亞文及埃及文，發明了二十二個拼音字母，續由希臘人與拉丁人之仿效推廣。公元前五十二年，凱撒平定高盧，並帶來拉丁文，繼之先後融合了羅曼語、克爾特語、阿拉伯語、義大利語、西語、葡語、德語及英語。西元八一三年，法蘭西民族開始擁有自己的語言。因在圖爾天主教會會議中決定：允許教士可以不用拉丁文，而用羅曼語來傳教。

- 4 語言是流通的，尤其在歐陸，從西方語源史中了解到法文曾先借英文字，又在現代英文中屢見法文借用並通行之字詞，法文字是英文中借用首位的外來語。數世紀以來英法兩國間的歷史糾葛，中世紀以來從王位繼承問題發動了英法百年戰爭(La Guerre de Cent ans (1337-1453)及其後的七年戰爭(La Guerre de Sept ans, 1756-1763)，兩國語言與文化上有同質化現象。日常用字如centre, chambre, fibre, gendre, litre, mediocre, theatre, filtre及metre等字字尾英式英文同法文。(參作者整理Appendix I English Words from French) 其次，我們可觀察到部分英文英語與法文用字的邏輯與用字之相似率最高，如英國人之樓層算法不同於美國人，反近似於法國人，第二樓視為一樓，較美式英文觀點不同。
- 5 法國人將閱讀視為最重要的七種文化娛樂活動之一，全民圖書閱讀率為西歐之冠。根據2005年調查，其國民圖書閱讀率為78%，2004年英國國民圖書閱讀率為66%，2000年國民閱讀行為調查，其國民圖書閱讀率為75%。此外，法國最有名的讀書節目「猛浪譯」(Apostrophes)紅遍全歐，家喻戶曉。其主持人畢佛(Bernard Pivot, 1935-)，在十五年的節目主持期間，讀過近4,000本書，靠閱讀文字、談文字，而馳名於世。  
反觀中國，台灣與中國大陸在2005年同期調查，全民圖書閱讀率分別為58.8%及48.7%，之後，2011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陸漸漸提昇至53.9%，但台灣逐漸偏離50%，令人憂心。[參《遠見雜誌》合作進行「2010台灣閱讀大調查」(Oct. 04, 2010)及新華網(April 19, 2012): <http://reading.cwgv.org.tw/displayPageBox/gvfcCHCTA.aspx?ddsPageID=CHNEWS&dbid=3234564503>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12-04/20/c\\_123010576.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12-04/20/c_123010576.htm)]
- 6 著名的美國小說家與戰地記者E. M. Hemingway (1899-1961)，年輕時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赴義大利邊境擔任救護人員時嚴重負傷。年約二十五歲時，開始定居於巴黎。
- 7 因此法語發音太過規則，致法國人難讀出多變的英、美語發音。
- 8 這個喉促音亦可在德語與俄語中發現，但以德語中發的喉音較重。
- 9 Ex: 1) Il est tudiant. (在主詞與動詞/動詞與形容詞間，有連續兩個連音)。  
2) C'est un homme/un outil/une usine. (動詞與名詞間，有連續兩個連音)。  
3) bien adorable / très original(e) (副詞與形容詞)。  
4) dans une salle / dans un livre (介詞後連音到不定冠詞)。  
另外，如副詞片語中Tout entire, tout autour, tout au long, petit petit;介系詞片語par avion (航空郵件)等，以及國際書信慣用語 R.s.v.p. (Rendez s'il vous plaît = please respond! 務請您(你們)回覆，尤其見於正式邀請函中)。
- 10 國內現有中央法文系(所)、淡大法文系、輔大法文系(所)、文化法文系、文藻法文(科)系與大葉大學歐語系，合計每年約招有近500員法文系科班學生，35員左右研究生。
- 11 Lee, Wenruei (李文瑞)(2004). < Pro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Predicament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Taiwan > (<初探台灣英語教育之現況與困境>) (presentation), 1st Annual Conference of Cross Strait Institute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Multimedia Teaching Seminar (「第一屆兩岸外語大學學院學術研討會暨九十二學年度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多媒體教學研習」)。文藻外語學院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Kaohsiung. Oct. 22-23, 2004。  
“根據美國和日本的“瀕臨死亡語言中心”估計，每兩個星期就有一種語言從人類世界中消失，而英語霸權正是促使世界語言迅速消失的元兇。「國際化」是目前台灣全民英語運動的最主要理由，但是英語，並不同於國際；更精確的說，全民學英語其實是「美國化運動」。” (夏曉鵬，〈反思英語霸權〉，「名家專論」中國時報。Feb. 14, 2004)。

- 12 Chen, Guang-Xing (陳光興)(2010). < After Perusing Zuneihao's "Take the Asia as Mean" (1960): Reflex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ent Knowledge > (「細讀竹內好1960 <作為方法的亞洲>一文:省思當前知識結構」). 《High Education Ideal and Goal Reflexion Conference》(高等教育理想與目標反思研討會). June 11, 2010. Taipei (Taiwan, ROC), Human Sciences of Shih Hsin University, Celling Conference Hall of Management Faculty Building.
- 13 目前世界使用CEF國家如下列:  
CEFR在2001年被歐盟41個會員國採用,採用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丹麥、德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盧森堡、荷蘭、愛爾蘭、丹麥、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瑞典、芬蘭、塞浦路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這些國家使用CEF共同語言參考架構於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材規劃、師資培訓與評量工具。歐洲以外還有香港、台灣、日本、紐西蘭、智利、墨西哥、哥倫比亞、加拿大等國家規定作為語言測驗的統一標準。
- 14 我國教育部為加速推動國內英檢測驗國際標準化,於94年6月28日(台社(一)字第0940075287C號令)通函各政府機構及學校單位,改採全世界唯一國際通用之歐盟語言能力指標(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作為「台灣官方英語能力指標」。
- 15 中法關係濫觴自十九世紀中葉清末鴉片戰爭與侵略,始末皆非基於友好交流。法國自1870年普法戰爭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 1808-1873)戰敗,回復第二共和國之後,積極想轉戰亞、非地區。中國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後,自1860年來法國即欲效英國開發海外殖民地,1870s覬覦中國的藩屬國(朝貢國)——越南,採取積極作為,此中法衝突並擴及台灣。1881年法國策動越南的反朝貢運動,甚至不再承認中國為宗主國,企圖藉以進取東亞與中國。法國趁中國內亂不斷之際,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與越南簽訂「西貢條約(Le Traité de Saigon)」,把越南南部六省變為法國殖民地。自此越南允許法國可以自由與越南貿易,而不必經過中國的同意,甚至將越南外交事務權交由法國監督。法國總理茹費禮(Jules F.C. Ferry, 1832-1893)派了二位大將,孤拔(Admiral, Amédée Courbet, 1827-1885)將軍與李司卑(Vice-admiral [rear-admiral], Sébastien Lespes, 1828-1897)將軍率領的其「遠東艦隊(l'Escadre d'Extrême-Orient)」,打算佔領海南與台灣,再消滅中國海軍。可惜事與願違,法國佔領台灣近一年後仍戰敗,最後完全撤離台灣。
- 1884年4月17日,李鴻章(1823-1901)與法國特使福諾祿(François Ernest Fournier, 1842-1934)(中國軍隊撤出,不再過問越南事務,但允許邊境通商,最重要的是中國不賠償。1884年中法爆發「諒山撤兵事件(la campagne de Lang Son)」,法國以中國毀約為由要求賠償一千萬磅,且決定以軍事佔領基隆(煤礦)為擔保。中法爭奪安南宗主權大戰於焉開展!
- 1884年7月13日,遠東艦隊偷襲廣州及福州造船廠,中國受重創;為了迫使清廷就範,法軍隨即準備攻打台灣,以奠定基礎與取得補給。8月16日法國上下議會通過增援軍費,並向中國正式宣戰。8月20日法軍在福州之戰,法軍大勝,清廷兩艦隊-福建及南洋(Fujian et Nanyang Flottes)幾乎全敗。8月26日中國亦向法國正式宣戰。法國遂取得台灣海峽制海權,並先後佔領臺灣基隆和澎湖。8月29-31日法艦再次砲擊基隆,基隆守軍亦開砲還擊。為積極攻擊台灣,孤拔將軍採用港口封鎖策略,10月1日法軍於今日仙洞一處海岸登陸成功,10月4日法軍又攻破大砂灣,基隆市區終告淪陷,清軍退到月眉山與獅球嶺一帶據山險防守。10月20日孤拔宣布封鎖台灣。1885年3月4-7日,雙方大戰三個晝夜,法軍才攻下月眉山,唯仍受制於暖暖的義勇軍。於是始終無法渡過基隆河。4月4日中法議和,正式停戰。但直到6月11日傍晚,孤拔將

軍亦因為水土不服,積勞成疾而客死於澎湖。6月21日,法艦鳴禮炮21響,正式降下法國國旗,離開基隆。7月22日法軍撤出澎湖。清廷於1885中法戰爭(la Guerre Franco-Chinoise, 1884-1885)後,竟與法方簽訂「天津條約(le Tienjin Accord)」,承認法國在越南權利、自由進出雲南、廣西。清廷打勝仗還簽喪權辱國的條約,實在舉世罕見!最後,蔣公在北伐、抗日、收復台灣後,完成開拓海疆,1946年自法國手中收回南海四島嶼(七美、望安、虎井、桶盤),這佔370萬平方公里的海疆,相當於三個外蒙。

- 16 參作者整理之法語區國內及國外相關機構組織與自學網站(詳參 Appendices V-X)。

- 17 法國文化部引導國家文化政策,並且主導法國文化保護政策。此一國家級專門機構成立於1959年,用以保護古蹟並傳承國家文化工作。尤其善用傳播媒體,在正確國語傳播上之努力不遺餘力,從未稍懈。法國國內電視臺要播放四成法語節目,外國影片幾乎全以法語發音。除了古蹟維護外,至今全國建有五座國家劇院,而從1680年在巴黎所建的第一座國家劇院,旨在傳播優美法語,即可見一斑。在語言之純粹方面的努力亦不遺餘力,如法國國內40%電視播法語節目,用意是傳承推廣國語及其歌曲。此一國家級專門機構成立於1959年來保護古蹟並傳承國家文化工作。但其政府亦在既定之文化政策外,仍能包容多元的文藝創作元素,如在1989年,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1916-1996)支持貝聿銘(1917-),享有“代建築的最後大師”美譽之華裔美人建築師,於名聞遐邇的國家級古蹟建築羅浮宮(Le Louvre)外廣場,建造一座兼具現代建築美之採光金字塔,作為法國文化創新之實例。

“文化保存”尤其在全球科技化與高度經濟化潮流中成為優先的議題。法國同韓國與中國大陸等國皆規定黃金時段禁止播出外國戲劇,尤其其本國自製率必須達到二十%,已是全民運動。東亞國家如日本及韓國的知識份子,以識漢字及擁有漢文名字為上層人士而自恃,一如西方人士之諳古希臘文及古拉丁文般珍視所學。二十世紀中共文革期間,毛澤東在試圖羅馬化中國文字不成後,得以成功地廣推簡體中文字。繼之,二十一世紀起台灣的主人翁復以“我手寫我口”之文明前原始記錄方式,大量使用國字偏旁、注音符號,甚至是特殊新符號,取代繁體中文字,互別時尚苗頭,或已顯露部分文化隱憂。自毀悠久文化蔚為風尚,恐無緣論及優雅之說。

- 18 法國皇帝及第一位共和國總統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祖籍義大利;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中,戴高樂總統(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有德國及愛爾蘭的血統;前總統薩科齊擁有匈牙利、希臘和猶太血統。

- 19 馬修效應(Matthew Effect),乃一源自聖經的典故,結論即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the rich get richer, the poor get poorer.) 相對地應用於學習亦然。外語程度佳者日久益精進;而程度不佳者恐益差。久之,後者面對各種能力的學習障礙,有全面放棄否定的可能。該效應原理近似美國企業家“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 1930-)的滾雪球理論(The Snowball)。

# 海軍軍官

## 讀者意見調查

A. 本期刊物哪些文章或題材合乎您的興趣且內容令您滿意？

---

B. 您希望本刊後續選擇以哪些題材為主題？

---

C. 您覺得本刊全新改版之之整體編輯設計、編排方式是否令您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意見：\_\_\_\_\_

D. 本刊吸引您閱讀的原因是（可複選）

☐可增進新知 ☐可供資料蒐整 ☐與本身職務相關 ☐文章內容引人入勝

其他原因：\_\_\_\_\_

基本資料（本欄僅為統計之參考，請放心填寫）

姓名\_\_\_\_\_職業\_\_\_\_\_職務\_\_\_\_\_電話\_\_\_\_\_

海軍軍官 季刊 第32卷第2期 中華民國101年05月 Quarterly No. **2**, Vol. **32** 2013.03

### 徵稿簡則

- 一、本刊為海軍綜合性刊物，提供本校教官（師）、學生及本軍學術研究及寫作園地，藉以促進研究風氣，培養術德兼備及具發展潛力之海軍軍官，達成本校教育使命，其宗旨如下：
  - （一）研究海軍學校教育、管理科學與人文科學，啟發人文思想與建軍理念。
  - （二）研究海軍科學、作戰、戰術與戰具等，提升國防科技，切合海軍「建軍備戰」、「教育訓練」之目標。
  - （三）介紹科學新知、海軍知識、生活資訊及一般報導等。
  - （四）砥礪學生品德與忠貞節操，培養並推廣本軍寫作與研究之風氣。
- 二、來稿以創作為主，且優先選登，或譯作以不超過每期篇幅50%為限，來稿內容應慎防涉及軍事機密，並恪遵保密規定；請勿一稿兩投或抄襲。
- 三、來稿以五千字至八千字為度，如原文過長，得由本社考量分期刊出。
- 四、來稿請以稿紙橫寫或A4紙張直式橫書印製，字跡務請繕寫清楚或附電子檔案，如附圖片請以清晰為要，電子圖檔解析度300dpi以上以利印刷，稿末請加註姓名、身分證號、學歷、經歷、現職、聯絡電話及地址；譯作請另附原文影本。
- 五、本刊對文稿有刪改權，投稿一律不退還，稿酬從優，每千字870元，圖片一幀230元，一經採用，未經本社同意，不得翻印、抄襲或挪作其他運用。
- 六、來稿請寄左營郵政90175號信箱「海軍軍官季刊」收，或逕送本社。
- 七、凡學術型稿件請依以下「註釋體例」纂稿：
  - （一）所有引註均需詳列來源，如引註係轉引其他論文、著作，須另行註明，不得逕自錄引。
  - （二）專著須依次列出作者、（譯者）、書名、出版書局、出版年份、（版次）、頁碼。格式如下：  
中、日文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書局，年月），頁X-X。  
西文專書：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 X or PP. X-X
  - （三）論文、雜誌、期刊等須依次列出作者、篇名、編輯者、書名、出版地、出版書局、出版年份、（版次）、頁碼。（期刊出版地、出版者可省略）格式如下：  
中、日文論文：作者，〈篇名〉，編輯者，《書名》，（出版地：書局，年月），頁X-X。  
西文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redactor,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 X or. PP. X-X。
  - （四）第一次引註須注明完整之資料來源，第二次以後得採一般學術論文之省略方式，為全文使用方式應相同。



郵票黏貼處

813

左營郵政90175號信箱

海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季刊編輯）收

海軍軍史館徵集

海軍早期文物

文件、照片、器物、圖冊、旗幟、衣物等

歡迎捐贈，請洽本刊

海軍官校

校區開放

實施對象：本校學生及官、士、兵、師、聘雇之親友

成功門開放時間：每週六、日08：00-21：00

歡迎洽詢